

研讨实录

第 76 期

76

解读《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蔡昉：“拉美陷阱”四部曲

——对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2201室 Address : Rm.2201,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一五年十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1993 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活动了 90 多次，成为了基金会的一个品牌。

从 2007 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 年和 2010 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胡旭照' (Hu Xizhao),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基金会最近二次学术活动的实录，分别为基金会举办的系列座谈会 2015 年第 11 期“解读《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第 109 期发展沙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关于“‘拉美陷阱’四步曲——对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的演讲。

在座谈会上，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胡汝银、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上海国盛集团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孙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张明海、圆信永丰基金总经理助理兼首席市场官沈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辉明等参与讨论，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主持。与会专家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的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即：如何评价《指导意见》、如何看待当前的国企改革概况、今后应该如何继续推进。专家们提出可从三方面着手推进：（1）去行政化。将国资委和中组部手中的考核与任免权还给国企董事会；实现国企高管的市场化，彻底取消行政级别，由董事会向全社会真正公开选聘，并给予市场化的薪酬待遇。（2）突破混合所有制的临界点。使国有股变成小股东，让不用心的国有资本搭用心的民营资本的便车。（3）打破央企垄断。这其实比混合所有制更重要。

比如在电信行业，给民营企业再发几张牌照，最后的结果，要么是中国移动变得和民营企业一样有效率，要么是它的市场不断的缩小。

在沙龙演讲中，蔡昉先生认为，可将拉美作为一个参照系，因为拉美是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群体。他按照拉美走过的路程，把中等收入陷阱划分成四步曲：从高速增长到减速；从减速到停滞；利益分配格局恶化；体制固化僵化。他认为，中国可从拉美陷阱四步曲中得到启示，通过清除体制障碍获得改革红利，通过若干重要领域改革显著提高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包括（1）增加劳动力供给（2）提高人力资本（3）提高全要素生产率（4）提高生育率。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目 录

解读《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1
蔡昉：“拉美陷阱”四部曲	
——对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39
提问与讨论.....	56

解读《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系列座谈会 2015 年第 11 期

2015 年 9 月 21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我们开始吧，首先感谢大家到我们这里来参加这个会。一些人可能对我们基金会比较了解，另一些人可能不太了解，我简单讲一下。我们成立 20 几年了，以前是市政府下面的，2004 年改制后脱钩了，现在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非营利、研究性的公益组织，以研究为导向的公益组织。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呢，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内部开会，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因为《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出来以后，媒体也有很多报道，当然总归是报道正面。但是我们比较希望能客观全面地来看这个事情。我们有时候开会也整理一些东西，也给领导看，他们其实喜欢看。为什么？因为他们老是看那种正面的汇报，我们有不同意见，他们觉得比较好，包括市领导、政协、人大常委会。我们以前的会长沙麟，现在的会长胡延照，人家碰到他们就说，你们搞的东西不错，因为我们有不同意见。我过年去看他，他甚至还说，你们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尖锐了嘛。我把这个作为一个开场白，就是希望大家能客观地讲。

这次给大家出的题目是国务院关于改革的指导意见。我想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讲，第一，从文本角度你们做一个评价。哪些东西觉得很好，哪些觉得还没有达到预期，或者有些讲的不是很清楚。第二，从社会舆论角度做一个评估。因

为出《指导意见》以前，已经讨论了很多，出来了以后，最近几天也有各种评论。一个文件出来后，解读也很重要，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你们对这些解读有什么看法，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国企改革也不是今天开始的，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王世豪以前也讲过，你们上海银行有过很多改革。你们预计基层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大家畅所欲言。要么刘胜军先开头，微信上我也看到你最近对此有一些关注。

刘胜军（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我说的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负面一点。

乔依德：没有事，我们畅所欲言。

刘胜军：《指导意见》出来之前，国资委一个发言人，他在微博上有几万粉丝，跟我联系说到上海来约我谈一下，说希望对国企改革能够达成共识。我估计他也事先沟通了一下，看《指导意见》出来之后，舆论对这个问题怎么反应。但是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还是谈了一些自己比较真实的想法。我觉得总体来讲，大家对这一次的《指导意见》是比较失望的。一是让大家等了那么多久，有点浪费表情，像你拍照一样，拍 POSE 摆了半天，结果出来的照片就这样。另外，《指导意见》出来之前，其实大家对国企改革看到很多很混乱的信息。比如说，中央抓的这个限薪问题，央企的合并，在资本市场炒作国企概念。但是我们研究国企改革的，都知道这两个东西都不能算真正的改革，甚至可以说是改革的倒退。我们看到欧盟商会也发表了一个白皮书，他们说中国的改革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分裂的，用词比较尖刻。一方面我们的文件说得都很好，但大家看到的東西或者实际發生的東西，可能是讓人非常困惑或看不懂的。

这次的《指导意见》，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让大家对国

企改革的期望基本上破灭了。我们讲的国企改革原来是有共识的，但是改着改着，这个共识或者方向就没有了。中国国企改革最好的黄金时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那个时期，特别是十五大，应该是一个高潮，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五大。那时候我们讲国企改革，方向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就是国企进一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另一个就是政企分开。特别是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来，企业和企业领导人不确立行政级别，这也是一个中央决议，不是很小的会议。当时在观念上、方向上，我觉得都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当时也有步骤，比如说股份制改造，大量企业上市，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虽然这些改革都没有终极解决这些问题，但至少是在朝一个大家比较认同的方向一步步前进。

问题就出在后来，国企上市，中国经济进入最快速增长的10年之后，国企成了盈利大户，我觉得这是一个转折点。这时候大家对改革的迫切性或者说压力，一下子消除了。消除之后，大家就不知道国企为了什么而改革了，或者说很多人对国企改革的必要性从内心来讲是否认的。他觉得国企不挺好的吗？还改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很长一段时间，国企改革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就是我们讲的倒退，或者叫失去的十年。

从我本人的观点来说，我觉得国企改革在今天来讲，是整个三中全会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环。之所以说它重要，首先是国企改革的难度是最大的，几乎所有困难都集中在一起，意识形态的障碍，既得利益的障碍，还有各式各样部门利益的障碍，都体现在一起。所以说它的难度是最大的，我们确实也应该承认这一点。第二，国企改革如果推不动，我觉得三中全会其实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因为我们知道，三中全

会核心的一句话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所谓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我觉得就是两句话，一句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处理好；另外一句话是，所有的企业要公平竞争。如果企业不能公平竞争，这个市场怎么发挥决定性作用呢？而对公平竞争伤害最大的，就是国有企业的垄断，主要是央企层面。我们有反垄断法，但这个反垄断法不适用于行政垄断，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光意味着三中全会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无法实现，实际上对整个中国经济的伤害都很大。我们知道，整个中国经济现在下行的压力非常大，这时候怎么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其实很大一块就是创新，有垄断就无法创新。从逻辑上这些东西很清楚的，但是做的时候确实阻力很大。这是目前国企改革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但我们看不到解决希望。这次的《指导意见》，对于行政垄断这个问题是轻描淡写，只是说这些垄断领域的一些竞争性环节向社会资本开放。这比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我觉得有退步。十八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是要打破这种行政垄断的，现在退到只是开放行政垄断领域中的一些小环节。这从力度上是一个退步。

另一个国企改革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学术界在八十和九十年代，特别是像张维迎这些人，花了巨大的精力论证清楚，基本上取得共识了。可能林毅夫不大赞成，但我想大多数官员和学术界是比较认同的，认同什么呢？如果不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改革，这个国有企业要搞好的不大可能的。但对这样一种观点，官方始终抱着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反驳这样一种理论。为什么呢？因为国有企业不管再怎么界定，再搞国资委，最终解决不了代理人问题。国资委的官员关心国有企业的利益，

不可能像一个自然人股东那么关心，这中间的利益关系不一样的，所以代理成本很高。另一方面，他们又比较犹豫，他们终于抓到一根稻草，就是淡马锡。他说，你们不是说国有企业搞不好吗，你看淡马锡搞得多好。这是他们的一个精神支柱，因为淡马锡的存在，他们始终不放弃这样一个幻想，就是说，国企可以在不触动真正产权制度的前提下搞好。

这一次对政企分开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也是在倒退的。原来的政企分开，一是取消行政级别，另外一个就是管理上，政府不能对企业进行微观干预。但是这次国企改革，从政企分开角度来讲，重点强调两个，第一是强调搞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或者投资控股公司，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式的淡马锡。但是我们都知道，包括国资委很多人去淡马锡考察，大家一致的结论是我们学不会淡马锡。因为淡马锡真正的区别是，它能够像市场化一样行为，它有这种自由度，作为大股东，不管是持股 51% 或 21%，它完全可以从国际上选聘高管，给高管以市场化的待遇。淡马锡完全市场化了，而且政府从来不会想着从党、组织部、政府里面派什么高管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淡马锡是国企，只是从国有身份来讲的，从它的行为来讲，看不到和正常企业的区别。而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我们要做到这一点，从现阶段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

回到政企分开，《指导意见》谈到什么？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这句话过去一直在说，但是不怕说，就怕它落实，这次真的落实了。我们觉得这一次对党组织的作用，强调的力度是过去是没有的。如果按照这四个同步、两个交叉，其实就把党委、董事会和管理层全部搞乱了。最后，党委的人在董事会，董事会的人在党委，党委的人又是管理层，

管理层又是党委。所以在这种体制下，最后说了算的，肯定是党委。一方面强调市场化，一方面又强化党的行政力量。这里面其实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怎么处理，我们不太明白。这种改革，其实达不到它开篇所讲的真正的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中国的改革就是这样，凡是它提的抽象的东西，其实都是没有用的。开篇提的抽象的，就是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好，但是没有用。因为真正落实是看哪一个东西有可操作性，恰恰是我们讲的背离市场化东西，它的操作性非常强。而且我们比较震惊的是，居然连混合所有制也要按这个标准去作。原来我们想，你国有占 51% 的这么做也就算了，但是现在混合所有制也把党的建设作为一个前提，如果这样搞的话，政企不分，混合所有制最终是推不动的。对国有企业，大家谈的最多的就是几个概念，一个是混合所有制，一个是员工持股。这两个东西里面都提了，但提法是相当保守或相当谨慎的。这种提法不能说不对，比如说国有资产流失，避免利益输送，这在实践中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我们都记得，当年郎咸平一喊国有资产流失，这个东西戛然而止停掉了。中央强调这个东西是应该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只强调这个东西，而又不能指出一个解决办法，最终这个改革就不了了之了。肯定是这样，从郎咸平喊这个问题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没有任何进展。

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两个问题，仅仅是在目前这个体制内部讨论，其实是无解的。为什么无解？在国际上有两个教训，一个正面，一个反面。正面教训就是英国，当年撒切尔把英国大型航空、钢铁、汽车这些东西全部上市，全部私有化，而且做得非常彻底，没有发生我们所担心

的国有资产流失或内部人控制。俄罗斯就相反，全到寡头手里了。这个操作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在哪里？不是说私有化是洪水猛兽，而是说你一定要有透明的机制，这个透明的机制就是 IPO，只要上市了，通过上市的方式把这个股份转让出去，其实风险是很小的。我们想象一下中石化，如果国有股要减持，哪个个人能够通过股票市场操纵这个价格？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这个市场是比较有效的。所以，我们只要通过证券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有解的。员工持股也是这样。我们不是担心内部人控制吗？没有关系，如果这个公司或这个集团上市之后，你要搞持股，可以，你制订方案，小股东来投票。为什么小股东来投票呢？因为大股东是国有的，这里面容易出现一些利益的问题，你让小股东投票，小股东如果认为这是合理的，大家就可以投票。其实现在很多上市公司，就是做这类的表决，是完全有可操作性的。但是我们恰恰不知道中央的心态到底是什么？中央到底是否真心，中央改革到底有没有诚意？你是真心真意要做改革，还是只拿出一个概念来吸引一下大家，然后设了很多门槛，最后大家跳不过去，改革就不了了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其实看不大明白的。

我觉得这一次的指导意见之所以让人比较失望，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思想的解放，其实就集中体现在当年吴敬琏给中央写的那篇万言书上，吴敬琏当时为什么写万言书？因为当时的改革，大家争论非常大，凡是涉及到意识形态的争论，是无解的。当时就争论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是不是必须搞国有企业才是社会主义？当时吴敬琏给中央的这封信上说，所谓公有制、国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标志，这是苏联教科书的定义，而苏联

模式是失败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被这个概念束缚，我们应该是什​​么呢？只要我们实现了共同富裕，哪怕中国没有一家国有企业，我们也可以自豪的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反过来讲，你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但基尼系数比美国还高，你能说你是社会主义吗？老百姓也不相信。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思想解放，大家还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坚持，必须巩固，必须做强做大。

第二个就是思想观念的障碍。很多人还认为，这是我们的权力基础，当然文件里不会这么写，但是中央估计很多人会这么想。这也是一种观念的误区。如果这种观念的误区不打破，我觉得，国企改革要想触动垄断，触动政企分开，都不大可能。因为如果把它当作权力基础，你肯定要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上。这种观念为什么不对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对执政党来讲，要想巩固你的执政基础，最重要的就是让经济非常好，让老百姓非常满意，这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衡量国有企业要怎么看？就看国有企业对经济是不是造成了伤害，国有企业对民众满意度是不是造成了伤害。如果造成了伤害，它就不是权力基础，实际上是在挖墙角。但是对这样敏感的问题，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央领导的重要表态，也没有看到学术界在这个指导意见出来之前进行争论，这和过去是不一样的。就因为我们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没有思想的解放，所以最终带来了这次指导意见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对接下来的国企改革，相对来说是比较悲观的。我觉得，从目前来讲，我们看不出中央大刀阔斧对国企改革进行突破的迹象，所以我们认为国企改革，在未来的几年，也许会有进展，但是会比较难。

最后一个，中央提的分类管理里说工业和商业，商业里

面又有充分竞争。我们现在最大的悬念在于这个充分竞争的范围有多大。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它说，如果不是充分竞争的，必须国有控股。如果是国有控股，国企改革等于不改了。这个充分竞争范围有多大呢？很模糊，非充分竞争它讲了一大堆，什么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又是支柱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界定，如果你把这个东西界定得比较模糊，就像过去十年一样，国企基本都在这个里面了，除了一些地方小的国企，至少央企都在这里。如果你思想比较解放一点，把充分竞争划得多一点，我觉得国企改革的范围还大一点，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目前这种舆论环境下，包括中央对一些问题的表态上，我们对这个问题其实不太乐观。

乔依德：好啊。刘胜军开了头一炮，下面谁说？孙总。

孙健（上海国盛集团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刘院长从理论高度分析，我是干具体活的，所以我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从操作层面上谈谈。可能几位领导也知道，市里现在明确了，上海国资两大平台，一个是国际，一个是国盛，这个是比较明确的。对国盛来讲呢，一线的，对外的，最主要就是这两块。一块是我这个部门，就是资产管理部，我们最主要是非上市的存量这块的所谓盘活、处置、变现。今年为了配合国资，启动这个平台，我们成立了股权管理部，是做国有上市公司股权这一块。一个是资产运作，一个是股权运作，大概是这样。实际上我在外企干了差不多八年，民企也干过，现在在国企，几种体制我都干过。一直有争论，这个市场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我觉得还是从操作层面来讲。

我想讲几点体会。我个人和刘院长的理解稍微有点不一

样。我觉得这次《指导意见》应该还是具有比较现实的指导意义的，为什么这样讲？第一，还是问题导向；第二，贴合实际；第三，还是要抓住关键。前面几个我先不讲，总体要求啊，分类啊。因为我们国企确实是差异性太大，所以一定要有分类。我干具体活的时候也在想，为什么国有资产运作比较难，比较复杂呢？我自己总结三个多，一个就是我们的标的比较多，标的差异性比较大。因为我们涵盖的行业比较多，而且各个企业的经营状况、治理情况都不一样，就是标的的多样性。第二，我们运作的时候涉及的因素比较多。原来在民营和外企，很简单，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实际上就是商业利益这个单一目标。很简单，不涉及到什么员工的安置。反正按照劳动法，总归做一年付一个月的钱，就完了。如果是我们做的话，今天五点钟，一个电话过去，叫他礼拜一过来，钞票付给他，就结束了。国企的话，我现在的体会啊，这就烦了，稳定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合规的问题，那个因素太多了。第三，我们运作的时候，考核的标准比较多，多重标准。这是因为我们的特色了，这个没有办法，既要考虑经济利益，又要考虑社会效益、社会反响什么的。我自己体会，现在做国企这么多年，从运作来讲确实蛮难的。但是这次《指导意见》，我觉得讲的还是比较到位的。第一是分类，商业类，工业类。而且商业类里再分，充分竞争，什么重要行业、关键领域，还有专项。刘院长讲的是对的，这些如何来界定，没有范围。但是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真的要拦一刀，这个标准谁也定不出来，没有办法定。各地情况不一样，在有的地方一个行业是充分竞争，可能到另一个地方就不是充分竞争，这个差异性比较大。

其他部分呢，22 页很多章节，我觉得这个《指导意见》，我归纳起来，实际上就讲了两方面，一个是改什么，一个是怎么样管。改什么呢，《指导意见》就具体讲了，我觉得六个方面确实都是比较关键的。第一，股份制改革；第二，资本结构，这是我们国企比较弱的地方；第三，国企领导层的结构；还有薪酬分配；用人制度；最后一个加强党的组织。其中有两个重点，一个是股份制改革，特别是关于混合所有制，专门有一个章节。我自己认为，这确实是我们改革的首要的推手，很多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所谓的一股独大，从股东结构来讲不是一个最优化。一个人说了算，如果让其他所有制的东西进来，实现股权多元化，也包括国有多元，几个国有股东也是多元化。第二，混合所有制也包括员工持股，员工持股以前受到过一些挫折，由于执行过程中不规范发生了问题，这次也提了。也包括企业整体上市，由社会大众股东一起来参与。我自己的理解，这确实是首要的推手，因为股权结构如果发生改变，治理结构就跟上了，包括薪酬制度、用人制度，实际上就完成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走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如何加强党的组织。刚才刘院长讲了，我实际上也在想这个问题，国企里面强调党的领导，到底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个国企啊，特别是中国国企，法人制里面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企改革，这是我们的特色。但是我后来又仔细看了看，这里面它的基本角色，我觉得还是讲的比较清楚的。是不是兼职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什么地方，你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看《指导意见》里面，最主要的是这么两条，一个是所谓的反腐倡廉，还有一个主要是讲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这里面确实具

有一定的我们的特色。我觉得，这个和经营层如果处理得好呢，也不矛盾。比如说董事长，在股东层面就是董事长的角色，有时候他又兼党委书记，实际上在反腐倡廉、保护员工利益的时候从党委书记的角度发挥作用。所以我觉得，如果处理得好，实际上这个也并不矛盾。这是讲改什么。

怎么管呢？我从工作角度可能更看这个怎么管。实际上它也讲了四个方面。第一是管理转型。现在我们强调，原来是管企业，现在要管资本。这里面实际上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股东和经营层的关系，股东干股东的事情，经营层干经营层的事情。今天上午开会前，我们下面一个公司搞混合制改革，我就跟他讲这个事情，股东层面发挥什么作用，经营层发挥什么作用，这个要弄清楚。

第二是讲管理的重点，也是四个方面，也讲的非常到位。一个是国资布局，从比较高度的角度上，是更大的国有资产的布局，涉及民生的、国家经济安全的，这是国有的，应该要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布局。第二个就是资本运作，资本运作实际上就是怎么使股权多元化。还有两块，无论是外企也好，民企也好，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资本回报和资本安全。实际上我觉得，如果从股东管理角度，就是从这四个方面管。

第三讲管控模式，管控模式就是讲成立平台公司。这里面有三层，国资委和下面的产业集团，现在变成国资委、资本运营公司和产业集团。我的理解是，实际上因为国资委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所以从市场化角度来讲，它直接作为股东肯定不太可能，所以要通过一个资本运营公司，更好地以市场化来运作国有股权。

第四是管理范围。现在明确了，实际上是一个全覆盖

的，叫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管理，当然它后面拖了一句，以后其他的一些国有性质的国有资产，也要纳入管理。重点谈了一个所谓的防止国资流失。实际上刘院长刚才讲的，我也深有体会。我个人理解，第一，国有资产流失这个标准是什么？什么是流失？我觉得我们看这个问题，要客观、辩证地来看。怎么叫流失，怎么叫不流失？标准是什么？我认为是这样：实际上要防范的话，核心是两条，一个是公开透明，不要暗箱操作，这个非常重要。第二个，公平机会。至于你说评估高了低了，因为我具体干评估备案，评估公司、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方法什么的，我都很清楚，参数稍微差一点，就差远了。这个参数到底取什么，各人看法不一致。

综合来看，国有资产价值评估看上去简单，实际上不简单，因为它不完全看报表，考虑因素非常多。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考虑的问题。2010年，浦发大厦，我们把它转让掉，经过54轮，拍到最后14.7亿，一共有五家参与竞拍，卖了。当时领导讲很好。结果过了两年，上海房地产市场涨了，一个客户过了三年以后跟人家合作，估价17亿多了。结果有人说，当时是不是国有资产流失了？那怎么叫流失呢？这是市场情况发生变化了，怎么能叫流失呢？要历史辩证地看这个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一方面。所以我自己学习总的体会，觉得《指导意见》见还是讲的比较清楚，比较到位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讲对上海落实到具体工作。我觉得对上海国企的改革，《指导意见》也具有比较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觉得上海国企是这么三个特点。一个就是数量比较大，从全国来讲，可能就是上海国企体量最大。第二个是布局比较

广。第三个是基础相对比较好，相对外省市有些国企，我觉得我们的企业管理相对还是不错的。但是上海国企面临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传统行业转型发展的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我觉得现在的国企，不是说要你改不改，实际上从自身来讲，就是受到这个压力。因为现在上海的环境，包括人力成本、土地资源、环保因素，逼着你转。我们下面的一个企业，生产蛮好的，产品供不应求，但是因为它的产品有一定的污染，周边老百姓写信举报，因为大家比较重视环保，所有必须要关。现在压力太大，必须要转。怎么弄呢，我觉得要增强上海国企的活力、竞争力，要通过股权多元化，这是一个方面。为什么我们现在强调股权意识？国资运作主要以股权为主，当然有债券和实物资产，但主要还是以国有股权为主。要通过多元化混合制，特别是企业上市，搞活机制，推动优化布局。上海企业也要走出去，从产业链来讲，可能要有有一个走出去的过程，现在讲什么一带一路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要提升，如果现在纯靠制造业肯定不行。比如说商业，买奢侈品都到国外去买，美国奢侈品的价钱估计比国内便宜三分之一。比较低端的在国内买。我们现在实体确实蛮难过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转型。

这个落实到我们国盛来讲，就是发挥国资平台。我学了《指导意见》以后，特别是对我们工作来讲，我觉得是有这么几点启发。一个叫依法履行国有股东的权责，你是股东，你不要缺位。第二个，经营的时候不要越位，要分开来。市场经营就是企业经营层管，股东不要管太多，管太多也管不好。我们下面有很多企业，我们不可能全部懂，所以经营的事情不要越位，就要经营层管。股东的事情你必须要做好，不要缺位。从股东来讲，我们还是要积极扮演股东的角色。

比如我们来讲，主要是三方面，一个是协助盘活存量，企业清理也好，资产处置也好，怎么样盘活把现金收回来。另外就是支持企业增量投资，这是一块工作。第三块是进一步优化企业股东结构，如果企业要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或上市，我们要积极配合，要参与，主要是这三个。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我们的工作聚焦在这四方面：就是国资优化布局、资本运作、资本回报和资本安全。这样的话，我们工作应该能抓到位，抓到点。

我觉得这次办法里对配套政策措施没有讲的很具体，就是最后点了一点。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如果配套政策不健全，实际操作就落不了地。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上次和国资委讨论这个问题，比如实行混合所有制，他说也是要挂牌的，我觉得从挂牌这个形式来讲，问题不大。但是我们要考虑具体问题，一个东西如果全卖掉，就无所谓，反正给价格出得高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卖掉部分，我还在里面就不那么简单。如果我是增资，不是转让，我们一直碰到这样的问题，那时候我选择合作伙伴就不完全是价格因素了，要考虑理念是不是一致，对企业发展、未来的想法是不是一致，这实际上有非常多的沟通。沟通好以后，最后冒出一个人，现在市场上有钱的所谓土豪蛮多的，那时候你说只考虑价格因素不考虑其他，以后就会给我们带来隐患。所以，我觉得配套措施和相关规定，应该尽快产生。《指导意见》出来，我看看是很好的，但是相关配套要出来，否则贯彻还是有难度的。我谈点比较肤浅的体会。

乔依德：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谈。另外我问个问题，对象你们这种平台式的公司，你的股权激励怎么做？

孙健：我们平台到底算是商业类的还是公益类的？

乔依德：应该是商业类的。

孙健：我们也承担一个特别的任务，如果说是商业类，也可以说。我们做这个东西，不是盈利为目的。因为有时候，我还要让利，有时候要解决一些特别的东西，亏钱我也要做的。这就要看了，如果合作的人，只是盯着回报，就没有做了。

沈明（圆信永丰基金总经理助理兼首席市场官）：按照党的要求，国有资产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啊。

孙健：我们领导也是讲，交办任务也要市场化运作。

沈明：但是市场化操作要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以效率配置最优化为目的。

乔依德：你们平台和 PE 不是一个意思吗？PE 本身不是公司，是投资别人的，但 PE 也有激励机制，它收 2% 管理费。

沈明：PE 因为资本的来源，来自于个人，或者集体，或者公司，不带有共产党的身份。

张明海（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国资，出这个文件以前，是分三类的，有经营类，公益类，还有功能类。

沈明：他们就算功能类，为大家服务的，不可能是商业类的。

刘胜军：另外我再稍微补充一点，就是薪酬。这次的人员薪酬是双轨制，一类是职业经理人，一类是党管干部。我觉得这个划分是想两者兼得，但最终实现不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董事长总经理往往是党管干部，我们都知道，对一个企业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如果这两个人被管死了，这两个人不是市场化的，这个企业就不是市场化的，它的行

为就是政治化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薪酬双轨制的意义不大，最终还是解决不了市场化的问题。你把最重要的两个人管死了，市场化从何谈起？这是最终的结果，这也是比较让人担心的。

乔依德：还有谁讲讲？

张明海：我讲比较简单一点。这次文件里对国企的监管体制，说法比较多。监管体制长期以来，一直被大家诟病。前一轮改革当中，国资委成了众矢之的，它有监管责任，而且管的很细，有很多行政性的方法。政府要做五年计划了，国资委也要做五年计划，每年要弄计划，他来批，管人，管事。管人分两块，一是组织部管，一是国资委管，可能中层里有很大一块是国资委在管，它管的很细，这是长期以来比较被诟病的地方。这次国资监管要从管国企向管资本转变，这是它的一个说法。还有一个呢，把监管责任分开来了，完全经营性的由企业自己来决策。还有就是公共管理的责任。特别提出要改变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文件上的。

我们在仔细考虑它的架构的时候，我们在想，它可能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安全问题，因为国企很多，至少从决策层面上看，国企有很多国家安全的问题。第二是要解决委托代理的问题。按照现在的架构来看，我们估计这两个问题会分成三块来管，党来管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经理层这一块管商业利益，附带解决委托代理的关系。国有资本经营和投资公司呢，代表国资的股东利益，解决委托代理的关系。对国资监管，到底是采取国资委这个体制，还是按照淡马锡的模式，从长期责任和现在出台的方案来看，我们在猜，也不是说很肯定，它是要走淡

马锡的路子。

但是如果走淡马锡的路子，会发生什么问题？第一，我们想想看，本来国资委这个体制里有很多问题，淡马锡这个模式能不能解决？其实国资委这个体系呢，包括你们国盛，我们曾经做过你们改革方案，也曾经说过要走淡马锡。但是在国资委体制下走淡马锡这条路子，到底面临什么问题？我们要想想清楚。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个说法，以管资本为主，管资本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觉得要把它理清清楚了。现在的意思就是说，管资本了以后，企业不管了，资产也不管了。我的意思是，管资本能和管企业分开来吗？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下，单单管资本，能不能和管资产分开？如果我们把淡马锡模式仅仅理解为出资人作为股东，不参与管理，这没有问题。国盛以后就看准哪一个方向进去，哪一个方向不行了，就出来，每年分点红，具体的经营不管。如果仅仅做到这一点，功能是很小的，这可以做到管资本。但是我觉得单单这样的话，其实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央企那么多集团，上海有 50 多个集团，单单一个国盛，或者再加一个国资运行公司，两家投资公司能不能管得过来？这相当于淡马锡这样一个机构要充当国资委的责任，管 50 家公司，50 家公司里有很多资本问题，也有可能是资产问题，要变卖一些资产，大型的设备、土地要变卖，然后又有很多职工的问题。现在政府交办的任务要你办，能不能管得过来？这些集团公司再继续往下面，又要投资，是不是也是淡马锡来管？或者是不是国盛来管？二级投资怎么管法？现在是 50 家大型集团，投到第二层有几百个，如果再往下投，可能国资的股权在一层层稀释，你只是管资本，能不能管到下面去？还是下面的东西就不管了？这其实

也不符合我们现在要的要求，因为它还是国资，这套监管体制并不能完全覆盖。这其实是它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问题很严重呢？我们前几年也调研过，像上海百联这种，如果要归类的话，肯定归在竞争类里。如果按照竞争类的话，淡马锡只管投资。前几年上海有很多边缘地区都没有商业布点，在国资委体制下很简单，市政府说百联必须投。这是作为一个公益任务或政府的行政任务，你必须完成，即使觉得生意不好，也必须去投，因为是政府交办的。但是在淡马锡的体制下，它能不能去投？不投的话，它和政府是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些问题，是马上就面临的问题。而且现在的文件政策表述，也不是说管资本，是说管资本为主，有这个主，肯定就有副了，有主副的话，就成了一个体系了，成了一个体系以后，不管以什么形式，其实就是一个国资委的形式出现了。好比说，你又要管资本，又要管资产，又要管企业，又要管里面的人事，又要管什么，其实就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东西了，一自成体系，那么现在国资委存在的理由就很充分了。如果监管很分散的话，可能经济委来管一块，发改委来管你的计划，组织部来管你的人事，每个人都可以管，但是最后没有人负责。如果它现在有主副，以管资本为主，以什么东西为副，自成体系，它就可以说，我必须有一个独当一面的自成体系的监管机构，国资委这个体系还是必须存在，不管以国资委这个形式也好，以淡马锡形式也好。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肯定就要有既管经济，又管社会各个方面的东西，肯定要管进去。我觉得这是回避不了的。

讲到这里，归根到底就是我们要思考，国资到底要发挥什么功能？刚才刘院长也讲过了，国资有个定位，它是要管

国计民生的，要掌握国际命脉的、国家安全的，这是国资存在的基础和功能。但是我觉得单有这句话，是没有办法操作的。什么叫安全？什么叫民生？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操作。如果要进一步推下去，下面必须要出一个清单，国资应该进入哪些领域，哪些领域要退出。而且这个清单，不像现在这样定，六大战略产业很笼统，好比说，环保节能类里有一些光电企业，现在叫太阳能的这种企业，很多东西我们也不要进入。不是六大战略新兴产业就可以了，还要往下面分。战略新兴产业是哪种，某个产业里哪个行业必须进入，那个行业又要分哪个环节要进入，这个细的程度。自贸区要出一个清单，出了两三年了，现在还是问题很多。如果要制定出这样一个目录，难度就更高，更没有操作性了。而且如果你制定出这个东西，定的太死，也不符合产业经济发展规律。很多产业是在发展中突然出来了，你要改这个目录，肯定要很长一个周期，但是要进入，可能半年一年里必须进入，我觉得这个操作难度也是很大。

如果你要进入或者退出，怎么理解混合经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作为我们一个发展目标。为什么要写这个混合所有呢？我不是很能够理解清楚。你说国资参股，当时就有了，为什么要专门提出这一个东西？现在对混合所有制的理解有几个层面，最小的是员工持股，这是最狭隘的一个理解。如果是这个话，就是在那么一个狭小的领域里，其实也面临很多问题，员工持股用什么形式？现在上市公司里，绿地集团是员工持股的形式，上钢集团也是员工持股的形式。绿地集团员工持股分三等，职工在一个一个小的持股公司来持股。上钢集团按照信托形式。用哪一种模式？其实哪一种模式都有问题。我们最近给上海一个集体企业做了改

制，它也要给员工持股，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很多了。我研究下来，最后报告是写成功了，但是我是和他们讲，按照集体企业或者公有制形式，你们做这个东西没有可持续性，过去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过了几年以后又会冒出来了。我这里不展开了。

还有一种理解，要搞混合所有制仅仅是想吸引民营资本进入国资领域。那么现在，民营资本最终可以进入到，好比国盛下面某个集团，参股到多少，现在说 30%。如果仅仅是 30%，没有控股权，民资为什么要进来？它仅仅进来收红利，来给你打工？也要考虑能不能操作下去。可能我们前面对混合所有制的理解都是错的。可能搞混合所有制的本意，是想让国资和那些民营资本兼并，想搞公私合营，再进行一轮社会主义改造，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思路大概也是这样的，我们国资改革的方向到底最后控制到哪一个层面去？这个是要考虑的。

外面对这个文件有很多意见，集中在三个方面，包括刚才提到的薪酬改革，对薪酬不满意，对激励机制不满意；对国资流失不能监管不满意；对坚持党的领导不满意。在政策讨论当中，这些话可以经过一些包装，用一些大家能接受的话，放在桌面上来讨论。刚刚乔秘书长说给一个总体印象。我最后谈一个结论，就是我对这个文件的总体印象：在那么多矛盾、问题都没有讲清楚而且没有办法讲清楚的情况下，在那么多利益冲突下，我觉得现在这个文件只能是做到这样了。三中全会报告我们也看过了，话可以讲的很漂亮，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你能够决定吗？如果你还不满意，他话可以讲的再漂亮一点，但都是做不到的。出来一个讲话，

出来一个文件，就可以把这个否定掉。所以现在的情况下，客观地讲，这个文件还是比较可以了，否则的话，我们不知道能拿到什么东西了。

乔依德：好，我们继续，汝银你讲。

胡汝银（上海证券交易所原首席经济学家）：我总的感觉是什么呢？这个文件，它目标太多，想的比较粗糙，没有形成一个逻辑思想的东西出来，也没有看到很漂亮的東西。它想解决的问题很多，方法也很多，最后当然不确定性也很多，你搞不清楚它到底会不会解决这些问题。

我还是欣赏新加坡的模式，尽管我们可能做不到淡马锡。我到新加坡和他们聊了很多，发现它在很多方面都比我们中国做得好的多。它从政府机构来讲，是小政府。淡马锡是有争议的，它控制了很多行业，淡马锡本身说，我要去搭便车，我不谋求在一个企业控股。

全球最有名的那些国家，国企运作还不错的，包括瑞典、新加坡、法国、美国、澳大利亚。但是我觉得背后还有一些其他因素。瑞典的企业分两类，公益性企业不是一笔糊涂账，你要完成这样一个服务目标，要有成本控制，这个它做得很好的。瑞典没有国资委，它有国资预算以及国资政策，必须公开，要让大家监督。刚才讲对这些企业进行监督，你怎么监督？没有办法监督。新加坡可以由官员担任那些企业的董事，但是不代表政府，他是作为董事。中国的官员不可以担任公司的董事，但是到最后，公司董事都不懂。

简单说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国企的低效率问题，一个是谁来监督运作国企的这些人。国外在第一层上监督国资运营，包括运营透明。我们现在国企讲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一帮人在这玩。在瑞典是看这个行业效率高不高，在竞

争行业如果效率不高，就不让你玩，甚至让你破产退出来。新加坡淡马锡就是采用 EVA 考核。你拿的钱不是随便玩的，要看你的效率。你董事在那个地方管资产的同时，要看企业管理规范不规范，公司治理规范不规范，董事会章程规范不规范。所以这又是中外文化的差别，瑞典也好，新加坡也好，那些董事很尽责，即使他没有股份也很谨慎。中国呢，我们有很多独立董事，忙不过来，他花多少时间真正履职？其实他没有动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后来跟他们说，从目前中国短期来讲，大规模推私有化是很难的，你要推也有一个过程。在到达那个点之前，当然还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讨论，比如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重工重要不重要？但是美国的所有的重工都是民营企业。但是中国行不行呢？你说不清楚。在上市公司里乱来的，最后发现的，最糟糕的就是民企，其次是垄断性的国企。国企里分几个，一个是垄断性的，央企是垄断性的，然后非竞争性行业里就是地方性国有企业。

我们这么多年，国企最主要的问题是，一个是国企政治化，第二个是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也是一个委托代理问题，但是性质不一样，它不是企业层面一般的委托代理，而是政府层面委托代表，资源在政府手里，政府官员大家为了把饼做大乱投资。所以现在全国的投资回报率不到 5%，银行存款利率平均是 7% 左右，资源配置的效率很低。当然银行的存款利率又有其他的问题。回头来讲，我们面临很多问题，上市、私有化，最终还是面临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刘胜军：这个问题我回应一下。我也同意，在实际操作中怎么私有化难度很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打破

央企垄断其实比私有化更重要。比如说电信行业，很简单，你给民营企业再发几张牌照，最后的结果，要么是中国移动变得和民营企业一样有效率，要么是它的市场不断缩小。在国有企业产权问题推不动的情况下，还不如做没有争议的事情，当然从政治上能不能下这个决心是另外一个问题。

胡汝银：那不是国企改革的问题，那是竞争的问题。怎么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美国是怎么做的呢？美国在建国初期，有一个洲际贸易法，各个州不能对本州企业进行财政支持。我们中国企业改革开放，就是各个地方都可以招商引资，土地什么都可以优惠。我们现在体制上的转型升级和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个东西要变过来，这个驱动机制要转过来。现在这个没有解决，下一步怎么走也没有解决。实际上在很多东西都没有明了的情况下，它提了一些东西，但是最后仍然叫你操作不了。

原来朱镕基和江泽民在上海的时候，当时一大帮人到处去调研。今天上海仍然面临当时那个问题，画地为牢，走不出去，上海一天到晚就是小家子。从另外的角度讲，就是你怎么样培养更多的企业家？为什么上海没有企业家？这个仍然没有解决。所以上海搞什么其他东西，都没有用。那天我们讨论的就是绿地和家化。绿地是因为最后让张玉良民营化以后，变成真正的企业家。而家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当然跟他选的合作伙伴，跟他自己也有关系，但是从市里面来讲，最终你把一个企业家干掉了。深圳为什么有很多企业脱颖而出呢？讲到底，就是深圳民营企业的自由度非常大。上海就一直被关死了，你走不出来。国外的企业家完全是市场化的。所以这是一大败笔。党管干部，不完全是管腐败问题，他认为要管人，管一大堆东西。如果是九龙治水，最后

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这个企业一定是低效率的。我研究过很多大学，很多医院，很多企业，最后发现：一个企业里只要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两个人都强势，这个企业就完蛋了，两个人干不了活，你整我，我整你，这个企业效率不会高的。最后党委书记对企业也不负责任，没有人对企业负责任，亏损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是九龙治水。我的归纳是什么？国有企业以前低效率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决策，包括组织部任命企业领导人，包括政府官员空降。最后它任免的人员失败了，他负责吗？没有人负责。企业的一把手是最重要的，一把手任免不好，这个企业不就完蛋了吗？董事会里，管理班子的任命，包括董事长的任命，是最重要的战略决策。

刘胜军：我看上海国资改革方案是失败的，为什么失败？因为要管三个人，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胡汝银：企业里有三样是最重要的。第一是选人，管团队的。第二个是企业文化，最后大家都在那里斗争，办公室政治文化。第三就是企业资产组合、业务组合。最后是没有人为这个负责，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但是瑞典很简单，包括淡马锡都很简单，你搞不好企业，我拿你是问，董事会没有选好，就是董事会失职。你又有董事会，又有管理班子，如果董事会不是在企业里最终的决策人，它决策失误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上海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选人的问题，企业文化的问题，企业资源配置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刘胜军：胡总你讲的，就是国企改革方向不明确。为什么方向不明确呢？因为我们的理念不清楚。十八届三中全会，包括最近习主席和李总理都讲两句话，叫既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我们这两句话都说了，但是实践中政府到底相信什么，其实不清楚。我们只看到淡

马锡表面上是一个国有企业，但没有看到这个国家坚定地相信市场的力量，虽然有国有资本，但却是彻底市场化。

胡汝银：新加坡是强调以民为本。瑞典也是这样的。我们是什么呢？最后是向上负责，是讨好上级，让上级满意，不管市场如何。瑞典的公益性企业也好，竞争型企业也好，最终是你要让客户满意。我们是倒过来了，我们是要让领导满意。资本市场里面呢，证券公司我讨好证监会。我觉得应该让证监会多放权，最后我们开了很多会以后，证券公司老总，包括基金公司老总，屁都不放一个，就我在那个地方拼命催。最后他们很多人说，你怎么能这么讲话？

8月25号的会上我提了，中国要搞制造业强国，根本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我们整个环境，包括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问题。你搞了一个好的项目，没有用，明天一大把项目全部上来了，你今年赚大钱，明年就亏损了。以前的上海，轻工什么的，包括手表，都是很牛的，但是后来，走不出上海，也没有企业家精神。厂长跟我说，我们和新加坡民营企业企业家相比，我们比他们素质还高，但是我们最后就是竞争不过人家。他有什么动力去把企业做得非常好？他即使做得很好以后，也很快完蛋。所以你看深圳的国企，当然它也是大浪淘沙，最后招商银行、平安，我们绿地就变成那样的企业了。国外也有好的国企，但是它最终是透明的，不管是市场化还是非市场化，都是透明的。现在财政部都想把钱都抓过来，国资委也想把权力抓过来，抓过来以后，谁来监督它？没有人监督，它怎么把东西做得很专业？讲到底是什么呢，新加坡也好，瑞典也好，它们在国企改革方面，包括管理方面，与我们最大的差异什么呢？专业。它的财政运作，它的国有资产配置，透明化的前提是专业。专业化的同时，

政治家以民为本，企业，不管是公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以客户为本，不是我们这样，讨好上级，向上级献媚。

现在我们和李光耀差太远了，李光耀的强势是什么东西呢？他强势是因为他比老百姓更加了解他们的利益，他不是以党为本，他最终是以民为本。这就是李光耀，他把西方的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比较完美地体现在一起了。新加坡有没有意识形态？也有，但是它真正把以民为本做到实处。我们未来怎么样做到这一点？新加坡不任命国企的高管，他可以推荐国企董事，但最终是由市场来评价的，是透明的。明年做什么事，国资委、国资公司怎么监督他们？监督不了，让市场让社会来监督，包括舆论来监督。我们现在都不能对政府发表任何负面的看法。所以我就说，第一，是去行政化，去意识形态化，包括要改掉不透明的任命，一定要让真正提名的人负责任，他的职业生涯要负责。新加坡有很多局长担任一个公司的董事，但如果那个公司他担任不好，会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他要是负责任的话，不是靠你们去监督，你们监督作用不大，它是这样一个透明的机制。第二，就是专业化，培养企业家精神，建设职业化经理人队伍。第三，就是有效的持股安排。我们现在搞了很多持股，但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张玉良不会把绿地搞糟，因为他的身家性命都在里面。如果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身家性命不在公司里面，他怎么会把这个企业做好呢？第四，就是防止和严厉惩治化公为私的利益输送行为和借花献佛行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我有个小兄弟，然后借花献佛给自己，就太糟糕了。从上到下，国企要透明化，股权要透明化。问题太多，先讲这些。

王世豪（上海银行原副行长）：我讲简单一点。前面都

已经讲了，大家都说矛盾比较多，我归纳三个原因。第一个，在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它的理论比较不清楚，只是文件的指导思想。一方面，国有资产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立国立党之本，国家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国资民资外资，各资本来都是平等的。但立国立国的需要，你肯定要垄断，你本来就在垄断里面，而且现在还提出做大做强。我们在国资里面提出要做大做强，没有什么；但如果你是民资，你是个体，你是外资的话，吓都吓死了，权力都在你手里，你现在这么厉害了，还要做大做强，我们还有没有吃饭的地方？这是我听民企讲的，这就是理论上的矛盾，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我觉得是模式的选择上的矛盾。第一叫党的领导，这是一种模式。过去党要领导，这次党要加强领导，限薪令都来了，国有资产不能流失。另一方面呢，要由市场来决定，而且选中了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这两个东西实际上也是矛盾。如果加强党的领导，淡马锡那个东西就很难。

第三个，就是监管部门之间的矛盾。监管部门大家刚才谈的少一点，我点一下。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重要？刚才刘院长说第一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重要的内容，为什么这么晚出来？就是中央权力部门之间的矛盾，说白了，就是财政部和国资委的矛盾，都要权。

刘胜军：还有发改委。

王世豪：如果真让发改委来做中间人倒好了。问题是这样，大家都想把钱抓在自己手上。最早确实是财政部管的，国资确实是财政部。因为很多大家都已经讲过了，我就不重复了。

这套体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要说中国人，老外都适应了，社会是假的，党的领导才是真的。我有亲身实践，

我们上海银行的外资谈判是全中国金融业第一家，1995年就谈了。入资是第二个，因为光大的朱小华先行一步，我们是第二家。但是 we 和光大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有 5 万个人股东，有 2400 家企业法人，这种复杂度、广泛度、多元化远远超过光大。还有政府，不是一家政府，所有的区政府都有我们银行的，我曾经一个一个电话打过去，他们入股了。还有外资。在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在研究所设计最理想化的产权架构模式，当时我是筹建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兼筹建领导小组成员，组长是华建敏。我觉得这个好啊，这个体制最理想，是最高境界。但是 20 年过去了，我做了 15 年的董事，所有的董事会我没有一次漏掉的，全部参加了。但是我们理想中的这种模式并没有实现，很多没有实现。董事会这一套和党的领导，开始外资董事还不太理解，后来全部中国化了，像亮红灯照样穿马路一样，他知道，大家都知道了。董事会讨论谁当董事长、谁当行长，老外提出来了，你们市委组织部批了没有啊？他都知道。这个章程都是假的，这一套东西来了。

还有内部人控制。就是你讲的，董事长、行长、党委书记三个人，谁最强势谁说了算，如果是二个三个强势，就一塌糊涂，我亲身经历。谁最强势，就大规模修改企业章程，为什么？我强势，把章程里的权力全部移到我这里来了。董事长如果强势，超过党委书记，超过行长，就大规模修改章程，我们修改过三次了。后来行长兼党委书记，他强过董事长，董事长靠边，结果又大规模修改章程，这个我都亲身经历过，这就是实践啊。最高境界的模式就是这样。

胡汝银：就是权力配置。实力变化了，权力配置变化了。

王世豪：没有一个法律来管。他要怎么写，就怎么写，全部改。

胡汝银：它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是党管干部，党说了算，随便任命。另一方面，就是内部人控制。

王世豪：此外还有一个。我本来想这么多人，这么多元化，决策机制应该是非常理想化的，应该是最佳配置。No！不是这样的。什么原因，我最后研究出来了。所以我在今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们的董事长坐在我边上，国企要改革，这是混合所有制要追求的目标。我跟他们的董事长讲：朋友啊，我们已经实行 20 年了，我这里还有老外，还有个人股，我们经过 20 年时间，你才刚刚开始，你的追求目标我们做了 20 年，不行！为什么不行？个人股东的代表是谁？董事是谁？是党指定的，党指定某一个人。2400 多家法人股东，再分民营股东来一个，全民股东来一个，党组织指定的，他指定谁来做董事。再来一个政府的股东，那么浦东新区有一个董事，各个区有一个，党指定的。这些人来了，在董事会像今天开会，全都听党的话。哪有代表五万个股东，代表 2400 个股东的？屁话都没有的，全部一致同意的，党领导说的算，而且都是党的干部。所以这个体制实际上是没有用的。最后有老外，老外不是共产党派的，老外倒真的是老外。但是我所处的这 20 年，正好是中国经济非常好的时期，它的回报率还可以，一俊遮百丑，他什么都不看，只要拿回报就可以了，什么话都不讲，他也明白你中国特色。我的亲身实践是这样一个结果。当然，现在他退休了，到别的地方去了，不是党的领导，不是党指派的股东，真的厉害，真的跟你拍桌子，跟党委书记拍桌子，你要这样干，就到银监局去告你，真是告的，告了之后，还有一件事

不行，就到法院去告，而且真的到法院去告。为什么？他是民营股东，是真正的股东代表董事，他自己六个亿在这家银行里，他就去告，法院也告过了，银监会也告过了，他不怕你。这个党委书记当时确实难啊，也是正厅啊，原来长期担任政府的地委书记。如果他再当大的官，他的想法不一样，这种人怎么可以进来啊，踢出去啊，一定是这样的。他现在没有办法。我都经过了。

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方案最后还是有进步的。历史总归是曲折前进的。第一个，毕竟它提出了管资本的问题，这是往前一大步了。毕竟提出了淡马锡模式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它还是国际化的，慢慢来吧，哪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这是第二个进步。第三个，应该说它还是顾忌到了反腐、群众利益问题。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资本获利太大了。它里面提到了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有股权激励，还有员工持股，这一点是大大进步的。应该承认它还有非常明显的亮点。好，我就说到这里。

张辉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我觉得呢，首先要说，中国的事情是找最大公约数，在做好最大公约数上它是有进步的。我赞成王行长说的这个概念，应该说它是有进步的。当然，如果我们倒过来看，就有一个究竟以什么取向来评价这个文件，盛洪有一个访谈公开这么讲。我觉得这种讲法呢，纯书生可以说，但是还是要看到中国的事情总是朝前一步一步推，首先应该肯定它的这些进步。当然背后是不触动现有政府相关部门既有分工职责。比如说，国资委、发改委、财政部，发改委管混改，所以发改委在这个指导意见出台后，已经组织会议了，联系电信、铁路要考虑混改怎么改。其实这就涉及到这个决定怎么执行的问题。这个《指

导意见》中，发改委管的投资是两类，一类是新设投资，一类是既存企业运营基础上的扩能，或者是延展性链条的项目投资。在这种新投资里搞混改，实际上是以发改委管审批投资为权力依据的，所以这个不触动现有的。

我觉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了。比如刚才讲的效率，因为银行系统这几年收益高，所以老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定回报就完了。但如果完全规范，也许这个银行在中国当时体制下也运作不下去，某些项目、某些业务机会，政府分配中不给你。这又是一个效率和社会主义是不是矛盾的问题，如果你顶真按照规范追求效率，效率和社会主义的方向目标是不是有矛盾？理论是一个问题，还要看到在这个背景下有进步。但在这个背景下，又兼顾了不触动现有体制。在深层次上，我总结国有企业改革有三性。第一是政治上的敏感性。你这个公司什么态度，你要把国有资金改掉，想瓦解共产党？这个就敏感了。这里就涉及到改革内容怎么理解，改革内容怎么解释。左有左的解释，右有右的解释。其实大家说的不是一回事。第二，产业的安全性。刚才讲的电信放开，其实我们放了，已经放了三四家运营商，主要还不是运营商的问题，应该是放定价权，这三四家运营商的定价权还是被管住的。它一定考虑长期营收，要争夺客户，要是价格没有差异，老客户干嘛要转到你这里来？你客户多，网络强，客户当中互相来往也方便，接通率也高。如果让民营电信运营商自我定价，马上就曝露出传统三家的低效率，因为它是在高定价中掩盖低效率的。我作为民营企业进来，因为我是后进入的，在一个动态的博弈关系当中必须以低价来争夺客户，这就涉及到定价权是不是放开，放到什么程度，那是真正的竞争。然后放

的时候马上碰到问题，现在全国 9 亿通讯客户，将来有 3 亿民营在运作，马上就说信息安全了，或者叫什么产业安全，能源也都如此，金融业如此，电信业如此。因为安全是不能出错的，所以谁也不能打保票说上，没有人敢说，只能是渐进的。这是第二个。第三，《指导意见》第一句话说，国有企业是全体人民的财产，就是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性。至少老百姓感觉这个还是我们大家的，对不对？改革改到现在，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一年多，老百姓就说，这个混改跟我们什么关系？还是有钱人去投资，这个有钱人是在前 30 年改革，政策不配套有很多漏洞情况下，那些人冒起来，发财了，今天给他们投资机会。所以就有了民生的关切性，这个没有办法动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指导意见》有推进，我同意刚刚王行长的判断，它有向前推进的地方。因为这个东西最后要落实，一定要公约数。

跟预期确实有一定落差，但是你必须看到它有进步，比原来有进步。因为三中全会决定的东西是他很理论、很抽象、很原则的，所以这次把一些原则具体化，当然这个原则就像刚才讲的，有很多矛盾的，操作上没有办法落实。理论上有几条进步，我总结了一下，不说政治形态的东西，就说具体政策举措。第一，在国有经济的定位上面，它这次加了一个力，原来讲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次加了抗风险能力。恰恰是在混改争论中，有一些人认为要保留国有经济，就举了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的 4 万亿，政府手里有米，随时随地可以直接操控。尽管按照 TPP，国内资本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是在今天中国这么一个发展阶段，在今天这么一个全球竞争格局下，政府手中捏一部分国有资本，美国人在危机背景下最后也是政府去管。回到全球今天共同的难

点，就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怎么处理。保留国有，后面就是国有究竟怎么实现，怎么治理，怎么运营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进步，就是抗风险能力。2008 年金融危机，4 万亿，房子大起大落，政府直接投资，是在特定背景下，这些东西有用了。当然这种危机发生的情况是特例。

第二，关于做大做强，这次的提法叫做强做优做大。中国的语言啊，这个顺序差异都有进步意义。因为在我们日常工作面，领导人，地方政府官员，或者我们日常讨论工作的时候，做大是琅琅上口说的，实际上证明大的不一定强，强了才能大，讲强实际上讲资本回报水平、资本活力，强了才能大，弄清楚了强和大的关系。

第三，就是分类。国资委说自己辛辛苦苦做方案，邵宁时代就提了，说分两类，一类叫竞争类，一类叫公益类。理论界马上就批评，这两个概念不在同一个逻辑层次上，竞争对应的是垄断，公益对应的是商业。这次改了，说商业类和公益类，而且在商业类里又分了商业 A 类，叫宜控则控，宜独则独，宜参则参。甚至也提到某些行业全部退出。然后在某些产业，什么基础设施、国计民生、国家安全，政府要控的。这种分类也是适应中国现阶段的认识能力，适应现阶段的经济结构，适应现阶段的管理水平，适应现阶段的体制环境，我觉得实事求是。至少三中全会决定里没有具体谈，只谈管资本的概念，这次谈怎么管，也分类了，这对实际推进有好处。上海分三类，商业 A 类，商业 B 类，当然上海用竞争类这个说法。竞争类实际就是商业类；公共服务类实际上就是公益类；功能类实际上就是政府要控的，属于特殊的某些领域、某些任务、某些目标。其实是一个意思。从这个意思上说，它也是总结了一年多来 22 个省市国企的地方

性改革方案。为什么地方能推出整体方案，中央推不出来？这就是体制问题。发改委推出 80 个混改，国资委在一片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拿出 6 个企业试点。劳动部、人事部、财政部联手，限薪方案也出来了。实践证明，各做各的不构成合力。联系我前面讲的三性，深层次是政治体制问题，后续也有部门怎么配合，所以我赞成王行长刚才分析的几组矛盾当中的一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用一个新的说法，就是国资、国企在理论上也不能一起说，因为一个是资本对象，一个是企业组织对象。国有经济改革操作空间很大，操作空间就看你怎么落实了。

这次说了，管资本为主，但这些东西是很难落实的。从实践意义上说，很难。理想很丰满，实际很骨感，什么原因呢？企业分布领域、企业组织层次、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组织体系和业务特点，有巨大的差异，分类就很难分了。比如说，广电重组，当时拆出 20 亿资本，10 亿坏账去掉，留 10 亿有效资产，然后上市。刚上市时口袋里钱很多，拿 5 亿给上汽，11 年来没有一分钱回报的。上汽现在分在竞争类里，你怎么考核我？对我这个企业而言，这个钱存在银行一年多少回报？如果我做投资，如果我做拆借呢？在这个意义上说，企业作为法人一定借助这种手段跟你在考核指标上讨价还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改革配套，商业类、公益类是弄不清楚的，没有办法定指标的。这里又衍生一个新的理论问题：真正的边界来自市场竞争，来自于市场发育，没有市场发育，哪有业务边界范围啊？所以只提国企改革，没有市场发育的其他改革配套，国企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二个，国资投资运营公司。在《指导意见》发布之

前，大家都说，媒体都说，现在是正式国务院批准了，学习淡马锡模式。然后在推介会上，吹风会上，又说我们是不一样的。你确实没有办法学淡马锡，因为人家是一个城市型国家，人家的经济社会构造、经济社会矛盾、经济社会存在的问题，是一眼望到底的，比较好解决。中国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太复杂了。所以一定有中国自己的因素，不是简单抄淡马锡。但是这个投资运营公司究竟怎么处理政治关系？说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你管资本是以什么手段、什么指标、什么机制、什么与投资运营公司之间的沟通方式、考核方式？这个国资运营公司与市场化的出资人之间是一个什么治理关系？你拥有足够的具有市场水平和法制能力的派出董事吗？刚刚王行长提到的，只要有民营资本参与的，他要跟你搏命的，他是唯效率的。效率和社会公平不是矛盾吗？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啊。效率和公平是有矛盾的，但是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究竟怎么兼顾？是先有公平后有效率，还是先有效率后有公平？这是人类几千年的古老话题。如果先有公平，效率一定损失。先有效率，政府第二次进入的时候，怎么处理税收，怎么兼顾社会公民利益？这里面很多东西有待创新和努力。三中全会决定是原则和方向，这个《指导意见》也是原则，只是展开了一定层次。真正实践当中，上海是都市型经济体；江苏是城市化水平相对高的地区；再朝西走，比如到湖北、安徽，那里的城市化水平没有长三角高；再朝西走，到甘肃、青海，差异太大了。实践里究竟怎么落实？我碰到过一个甘肃省社科院的领导，他说你们上海现在谈社会事务剥离，做得到吗？我们某个城市，就是因为某个企业进去以后，才有这个城市的。比如说，金川，就是发现一个铝矿，然后派 10 万人进去，带家属就 20 万人

去了，然后变成了金川市。大庆当年也是如此啊，是因为当年发现油矿，它是管理局、市政府一体的，后来才分的。这种独特的城市化带来的社会事务，必须是企业承担的。这就是中国。所以，这个《指导意见》提出的某些原则，在实践里，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社会竞争水平的市场环境里，很不完善，有待在实践里升华。这是我的一些建议。

乔依德：非常感谢大。可能有的人看正面的东西比较多一点，有的从落实的角度看负面比较多一点。如果平衡一下，对这个文件大概有几个方面可以考虑。从文本的角度，相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大的原则，这个又细化了，朝前进了一步。这当中有几条，包括分类、治理结构，至少在理论上还是朝前进了一步。但内在还是有一些矛盾的东西，或者说有一些冲突，刚才王行长也讲了几个矛盾。这在以后的实践中还要看，有一些也确实是难的。有一些意识形态考虑，你就没有办法说了。像你们外方一样，只要经济能分红，就能走下去，到走不下去了再回头来看，只能这样。撞到南墙了，大家回头再看，这个事情到底好不好。到底什么叫执政党的地位，怎么理解这个问题？今天微信上面，你们大概都看到，中央党校蔡霞有一篇文章讲怎么维持执政党的地位，你经济搞上去了，人民有更多话语权，说不定对执政党更有好处，这也是一种解读。但是目前来看，还不是这样解读。大家心里都明白，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不过我觉得理一理，还是满好的。刘胜军从改革的角度也讲的很清楚。

刘胜军：我再补充一句话。其实刚才听了王行长讲的，有个感触，我们现在的改革，方法论就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讲方法论，因为领导一开始就知道，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讨论既得利益在哪里。我们的改

革方法论错在哪里呢？我看记者采访国资委的首席专家，为什么出台用了将近两年？他说因为我们要反复协商，寻求最大公约数。我觉得这个改革指导思想就错了，改革怎么可能寻找最大公约数呢？寻找最大公约数的是这些人，大家利益没有根本冲突。如果国资委就是既得利益者，你跟它寻找最大公约数，它就是不改革，这个毫无疑问。所以我觉得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充分。一个是方法论，另外一个就是官员的激励机制。我们始终都觉得，我们光说要改革改革。但如果你是部长，你不改革；如果你是局长，你也不改革。中央没有正视官员的利益，你凭什么要求官员改革？官员的改革就是自杀。我觉得，不光是国企改革，很多改革都有类似的问题，这次体现的很明显。

胡汝银：我再插一句。现在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文件起草有关系。证券法由证监会来起草。这个主要由国资委来主导，国资委又要考虑其他部门的利益，总之是官员主导的，不是从中性的角度。

刘胜军：而且它所谓的最大公约数，还是内部人的最大公约数，不是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胡汝银：文件起草是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决定最后必然是这样，由国务院来起草，一定是官腔。

刘胜军：你要真的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还是一个进步，问题是它也不要你参与。

乔依德：行啊，那就感谢大家。反正头脑风暴，大家聊聊，开阔思路，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拉美陷阱”四部曲 ——对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

上海发展沙龙第 109 期
上海新锦江大酒店 2015 年 9 月 23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我们沙龙的演讲开始了。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先生，给我们做“拉美陷阱四部曲”这样一个演讲。大家对蔡昉先生也不陌生，他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然后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1993 年到 1998 年担任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所长，1998 年到 2014 年担任人口研究所所长。去年至今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蔡昉给我们做演讲。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大家晚上好。我选这个题目其实不是想讲拉美。大家知道中国经济减速了，自然有很多人用各种不同的概括方法来说中国未来的可能性。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从学者到官员，到我们领导人，现在都喜欢用的。最近，大家也知道，楼继伟部长讲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高，可能超过 50% 的概率。那么我想也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把拉美作为一个参照系，因为拉美是一个真正的可以叫做中等收入陷阱的群体。拉美的大部分国家，都是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而这些国家倒过去五六十年，甚至上百年，也是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长期处在

世界银行划分的中等收入这个行列中，一直没有毕业的话，那就叫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按照他们走过的路程，把中等收入陷阱划分成四部曲：从高速增长到减速；从减速到停滞；利益分配格局恶化；体制固化僵化。

这四步，也可以说是四个步骤，这四个步骤，迈完了，你就很自然落入中等收入状态。但更重要的是，我想用这个框架来比照我们中国处在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有多大可能遵循这四个步骤。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已经减速了，从长期看、短期看，都是一路下行的趋势，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这个时候，人们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有它的理论背景的。过去讲贫困陷阱，有马尔萨斯的理论，也有很多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等收入陷阱，从拉美经验来看，有四个步骤。回过头来看，如果这四步你都走完了，我想一定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落入这个定义。

第一步呢，就是他们这些国家，大部分经历过高速增长，到了个特定的发展时期后，一下子降下来了。不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从高速降到了中高速，而是降到了接近于停滞的状况，甚至还有有的国家倒着走。你从高速到减速也可能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不正常，一下子降到停滞呢？就是因为你在判断经济增长减速的时候犯了错误，你没有看出是什么原因导致减速，因此你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应对。你把应该减速变成了停滞。这就变成了第二步，这就很危险了。

到了第二步经济增长停滞，就意味着蛋糕不再做大了。过去蛋糕不断做大的过程中，可能分配不公，我也不高兴，但我自己也是得到的人。等到蛋糕不能再做大了，你再分配不公，就一定是一些人的绝对恶化为代价的。这个时候收

入分配问题就会恶化，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到了第三步，就是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一个恶性的变化。接下来第四步，这个利益分配是一个既得利益，那些能够取得更大利益份额的集团，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体制上把这个利益格局固定住。因此体制固化、僵化，任何改革都不能发生。这时候政治家可能采取一些缓解的做法。在拉美典型的就是民粹主义，为了上台，我承诺做所有你们希望我做的事，但是我上台以后呢，发现有两个难题做不了。一个是经济增长恢复不了，在既有的蛋糕上，我想把富人的那块分给你，富人不干，因为他们不仅是富人，还是政策的决定者。到这个时候，完整的中等收入陷阱就形成了。过去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讨论过一次，在经济学中，陷阱的含义就是一种超稳定的均衡，小力量拉不动它，即使拉了，一定还会回到那个状态。这就是我想讲的这个逻辑。

我从这几个部分来对比一下我们中国。第一步，就是从高速增长到减速，我们现在已经发生了。萨默斯最近有一个著名的研究，文章就叫回归到均值，他的预测是2013年到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降到5%；2023年到2033年这十年呢，就只有3.3%了。也就是说回到了世界平均水平。他没有讲道理，说这就是统计规律，任何高于均值的都是不正常速度，最后都要回到均值。艾肯格林他们也针对中国预测，用的是大量国家的数据，说发现高速增长到了人均GDP 17000美元（用购买力评价算），大概相当于中国目前的水平，这时候平均都会减速，平均的减速幅度是从过去的6.8%减到3.3%。如果这个发生了，也是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他尝试解释为什么会减速，比如说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及时替代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等。更新的是最近有四个俄

罗斯裔的作者，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最后要减到世界平均水平，但预计是很久以后，这个相对较乐观一些。减速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发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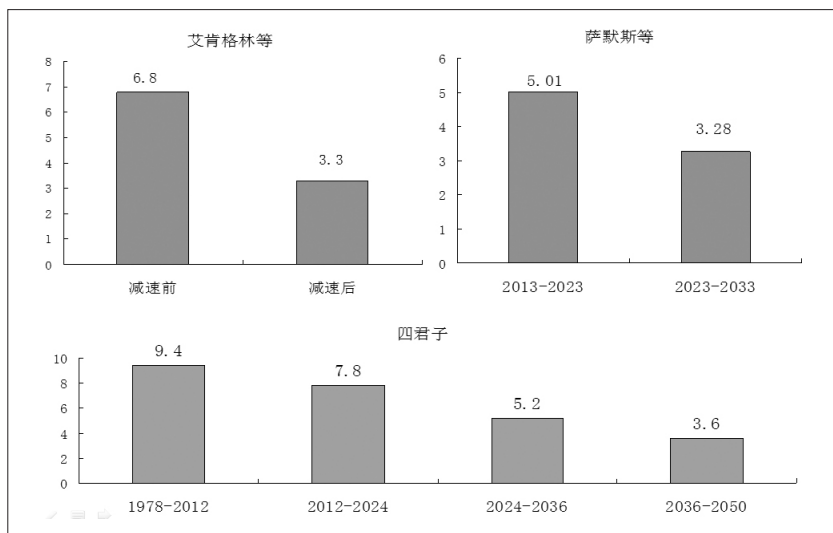


图 1：回归到均值：关键在于减速时间

刚才那几个都是相对悲观的，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还有乐观的，林毅夫教授乐观，他说中国未来还有 8% 的增长速度，为什么呢？他说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按照人均 GDP 算呢，是美国的 20%，相当于 1951 年的日本，1967 年的新加坡，1975 年的台湾年，1977 年的韩国。而这几个经济体，在人均 GDP 为美国 20% 的水平上，之后都实现了高速增长 20 年，日本是 9.2%，韩国是 7.6%。中国也是这个发展阶段，所以再过 20 年，我们 8% 没什么问题。

看上去，这个趋同论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想一下，中国有一个特点，我们叫未富先老，就是说，在同样的发展阶段上，我们人口老龄化大幅度高于其他经济体。我们过去

的高速经过增长和人口结构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老的很快，因此用人均 GDP 做比较不一定对。如果用人口结构来做比较，中国的人口和其他经济体的哪一个阶段相似呢？我做了一个，我们以劳动年龄人口（15 到 59 岁）达到峰值的那一年为标准，峰值意味着在这之前是增长的，在这之后是负增长。这一年呢，中国发生在 2010 年，正好是我们第六次人口普查那一年。日本达到峰值不是在 1951 年，是 1990 年到 1995 年，就是说只差中国 10 来年。韩国比我们还晚一点，是 2010 年到 2015 年之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之后才负增长。新加坡，按照预测还没有到呢，要在 2015 年到 2020 年，它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才达到峰值，随后减少，因为它主要靠外籍工人赢得人口红利。因此，如果按照人口结构来判断中国的发展阶段，那就远远不是五六十年代，而是跟人家处在相同的年代。他们已经没有高速增长，那么我们很可能也不会有高速增长，这只不过是换一个看发展阶段的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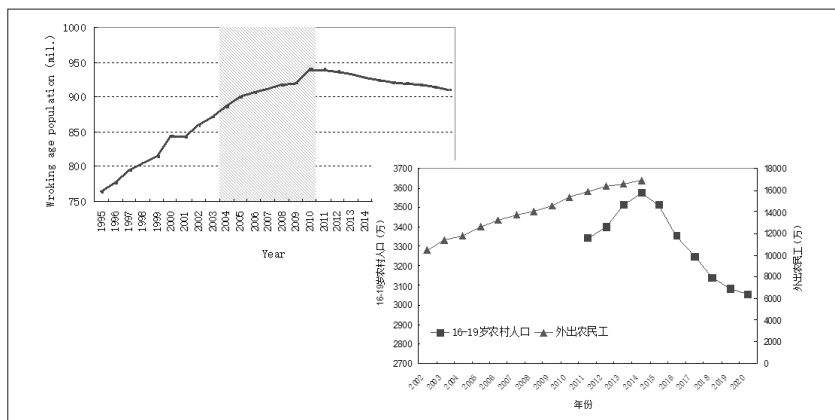


图 2：我国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

为什么人口这个角度有意义呢？我们知道，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当我们分解它的时候，主要是几个构成部分。第一，资本积累。资本积累贡献，在中国高速增长中大概贡献了 60%-70% 的幅度。但是资本的贡献也和人口红利有关。首先，当人口抚养比迅速下降时，你当然可以有比较高的储蓄率、积累率，从而有较高的投资率。其次，当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候，你投入大量资本，没有报酬递减现象，可以使资本的贡献达到最高。中国过去的资本回报率非常高。

第二，劳动力的贡献，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劳动力的质量。我们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这个转移是在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因为它是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其实占到了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接近一半。我们的增长几乎都是和好的人口结构相关的。当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了，人口抚养比例提高了，你一定会减速。所以，我们看到了 2004 年，首先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很快。从那之后，农民工的工资每年以 11% 的实际增长速度在提高。到 2010 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了。因此，我们认为这个转折是非常明显的。

其实还有一个转折，发生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农村的人口结构。我发现农村人口中，16 到 19 岁这部分人去年达到了峰值，今年就是负增长（图 2）。这部分人口很重要。现在有的时候官方说，老叫农民工这个词不好，能不能把它叫农业转移劳动力，有时候官方文件里也这么写。但是这句话不准确。因为我们现在每年进城的这部分人，其实没有一个是农业转移劳动力，只是学生而已。农业中务农的人，现在是很少的一部分，这部分都是 40 岁以上，甚至 50 岁以上的为主，他们不可能再转移。我们说农

民工，特别是新成长的农民工，其实都是学生，就是 16 岁到 19 岁，初中到高中毕业，或者辍学的学生。如果这部分人去年达到了峰值，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呢，从今年开始就是负增长，就是一路降下去了。所以我当时就预计农民工可能也快负增长了。结果随后我就看到了第一季度的数据，农民工就是负增长，第二季度略有增长，上半年合起来，增长了 0.1%。在 2005 年到 2010 年期间是 4% 的增长速度。今年呢，或许都达不到 1% 了。所以这个趋势也会逐渐加剧。人口结构影响到劳动力结构，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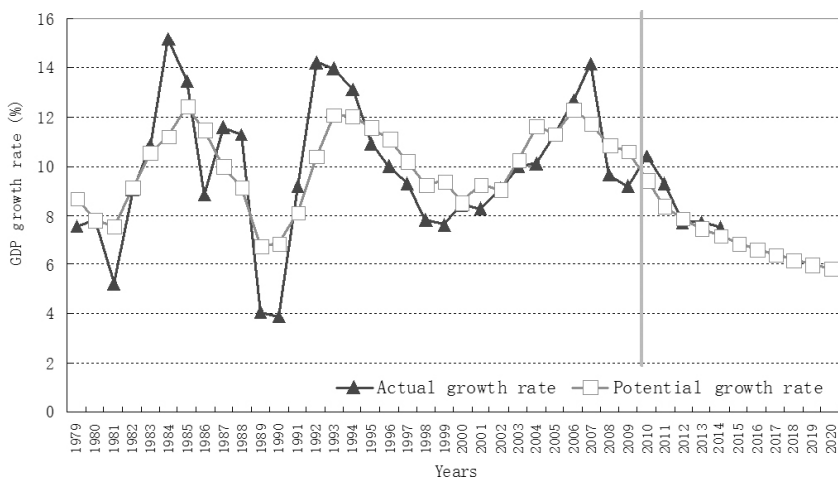


图 3：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估算

按照这几个构成部分，我们测算了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就是图 3 中方块型的这个。这个潜在增长率不应有这么大的波动，我也不想讲这个波动了。总体来讲，2010 年之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我们测算平均是 10% 左右；到了目前的十三五期间，平均是 7.6%；到十三五，只有 6.2%。这就

是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率。大家看，至少十二五这几年，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与实际是一致的，这个三角形的是实际增长率。潜在增长应该根据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生产率能够提高的可能性，来预测底潜在增长率是多少，这是我预测的结构。

减速是我们处在四步曲当中的第一步。但是第一步很正常啊，终究要减速的，你不可能经济很发达了，还有那么快的增长速度。关键是说，你第二步如何不犯错误，不至于把减速变成停滞，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看到很多前车之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错误判断形势。目前错误的判断形势呢，我认为是比较多的。官方说，我们减速是结构性的问题，是新常态，这个说的很准，说三期叠加也很准。但是每逢总理请学者出招的时候，我看到的几乎都不是从供给方来提，都是提需求的因素。总理说，我们的政策工具箱里面还有很多备用的工具，但是他没有点明具体有哪些。但他们提出来的那些，无非就是降息、降准、政府买单、财政支出、银行信贷，都是需求方的。

中国的减速不是需求方，是因为人口红利消失了，它的供给能力弱化了。如果认为是需求方，中央说的三期叠加还不够，还得加上经济周期。我们是不是处在经济周期中呢？我个人不这么认为。因为世界经济看上去很平庸，但是你撇开少数波动，撇开金融危机的前后，长期的世界经济就是现在的增长速度，现在的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比长期的增长速度更差。国外讲的新平庸，其实也是常态。

更重要的一条，如果是需求方因素，就意味着我们没有比较优势的下降。但是我们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计算了它的比较优势，2003年-2013年十年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

优势是下降的。它的含义是我们的竞争力不够了，因此我们在这些产品上的出口不如世界的出口增长快。因此不是世界经济需求不够导致的，而是我们还没有它增长快，因为我们比较优势下降了，劳动力成本提高了。我看到一些材料，中国几个主要城市的劳动力成本，高于亚洲除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几个高收入经济体之外所有的国家。因此，我们是亚洲第五或第六位劳动成本高的国家。

如果我们的问题出在需求上面，我们也采取了不少刺激需求的措施，它应该管用，因为需求不足，我鼓励，给你贷款，增加流动性，投在基础设施上，应该带动一些 GDP。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些刺激措施没有太大的效果。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是供给能力的问题，是比较优势丧失的问题，你发现企业没有强烈的投资愿望，是因为用原来的生产规模拿到国际市场上，人家不认可。别人不再需要这么贵的产品。这个时候，你鼓励生产，给贷款，他不需要。因此你放的这个钱是不容易到达实体经济的。这一点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总理、部长们、行长们都看到了。我们降了息，降了准，发出了贷款，但是企业没有积极性，到不了实体经济。他们以为是层层卡呢，其实过去我们也层层卡，但只要它有强烈的需求，总能到达它那里，现在他没有这个需求。因此，我们想到一个办法，说我们还是投在基础设施上，可以脱离实体经济。但事实上，基础设施对投资的需求也脱离不了实体经济，因为它的需求是派生的需求。

当年日本有一个经济企划厅的长官叫宫崎勇，大概相当于我们发改委主任，他后来写会回忆录。他是主张刺激的，他说为什么批准了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资金拨不出来？我逼着它把资金拨出去了以后，它不往下走，每一个环节我都紧

催慢催，弄完了以后，到了下边不开工，层层都没有积极性。他怀疑这个钱干什么去了，甚至怀疑有人把它挪用了，贪污了。到底这个钱哪里去了？实体经济到不了，基础设施也到不了。哪里去了，我们可以想象。

我看了一段文字，讲 1936 年凯恩斯第一次提倡政府刺激经济，他当时在政府一个委员会里面提出来。他的一个同事叫韩德森，也是经济学家，也是在那个委员会，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你发起了一个 2 万亿英镑的投资大项目，但是我敢保证你一年之内一个定单都不会得到，因为人们没有积极性发展实体经济。但是这笔钱对于今天股票这样的行业，却很有作用，会有刺激效果。因此它会留在那里，在你所希望的良性循环还没有开始之前，恶性循环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泡沫可能被你冲起来。

宫崎勇看到这个钱到不了实体经济，到不了基础设施。钱哪里去了？按照日本的经验，就这几个部门：第一，房地产；第二，股票市场；第三，海外资产。美国最着急的时候，日本恨不得把美国都买下来，包括海外的艺术品，梵高的画，印象派的作品。日本大量放出财政的钱和银行的钱，但是不往实体经济走，就在这个时候，泡沫刺激起来了，就是日本 80 年代后期。日本是怎么把减速变成停滞的呢？就是 80 年代后期刺激经济。但是日本的问题不是需求因素，因此刺激不管用。大泡沫最后破灭了以后，从那时到今天，日本失去了 30 年。我们可以把它叫高收入陷阱，如果我们重复了日本的错误，我们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如何看待减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完全和它的人口变化相关，人口抚养比例下降，有人口红利；人口抚养比停滞了，

潜在增长率就下去了。同时，日本又犯了错误，就低于 1% 的增长速度，到现在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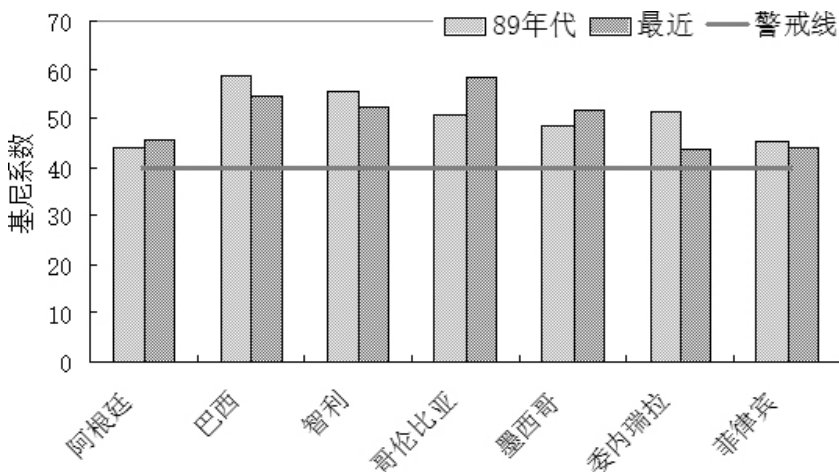


图 4：拉美——蛋糕变小分配必然非帕累托

第三步，利益分配格局恶化。我们讲四步曲的时候呢，可以写步骤的步，也可以写部委的部。就是说，它可能在时间上有一个逻辑关系，有一个相继性，但也可以在空间上并存。你还没有减速的时候，你也可以有很高的收入差距，甚至恶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但是到了这个阶段，它的恶化是最厉害的。因为只要我们再分配一次蛋糕，就一定有人绝对的恶化，甚至民不聊生。过去这些拉美国家，它的基尼系数，都是显著的高于 0.4 的所谓警戒线的。

中国现在出现了一个相对好的现象，就是说中国的收入分配在改善。我原来也做过一个判断，2004 年中国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它的含义就是劳动力短缺了，短缺的不是高科技人才，也不是技工，是普通劳动者。因此普通劳动者的

工资就要上涨，而且上涨的速度快于其他群体，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改善会快于其他群体。刘易斯转折点的逻辑后果，应该是一个库兹涅茨转折点，也就是收入差距到达了倒 U 字形的顶端，从那以后就要下降了。后来国家统计局向我们证明的，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 2009 年之后是下降的，到现在一直在下降。基尼系数到 2009 年以后也是下降的，一直在下降，虽然下降的幅度不那么明显，但是的确一直往下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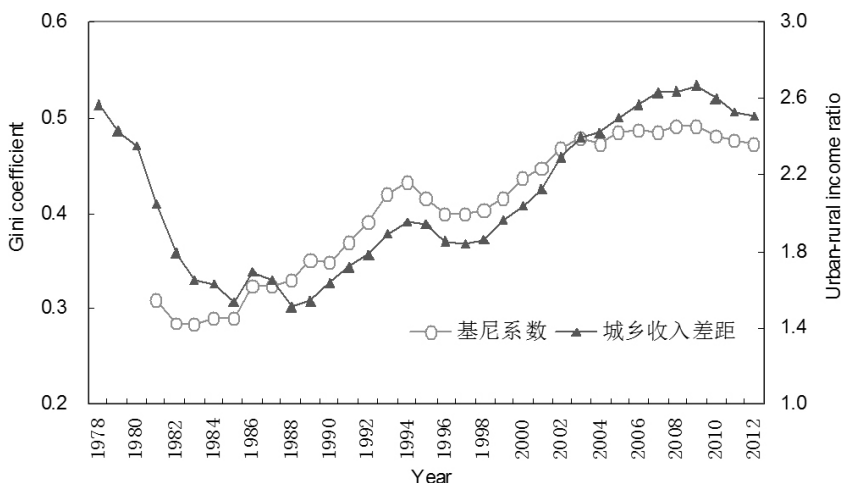


图 5：中国迎来“库兹涅茨转折点”？

大家也知道，好多人测算了不同的基尼系数。比如王小鲁，他说中国存在一个庞大的灰色收入，国家统计局没有包括它。这个灰色收入的规模非常大，它是以高度不平衡、不均等的方式分配的，也就是说，10% 的人拥有 70%-80% 的收入。其实我也做了一个计算，我把王小鲁的数，加在了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上。假设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中国城镇居民总

收入是 1 万亿的话，王小鲁调查出来的灰色收入是 3 万亿，就是说有两万亿都没有加进去，我们都把它加进去，而且按照王小鲁不平等的幅度加进去。最后结果很明显，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大大提高。但是趋势没有变，2009 年之后也是改善了。就是说库兹涅茨转折点可能已经到来了。当然这短短几年，我们还不能完全肯定，但是趋势已经显现了，这是一个乐观的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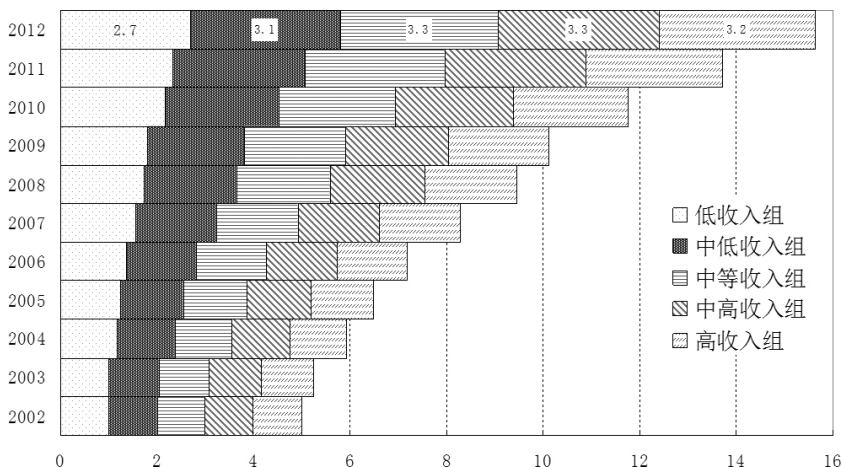


图 6：蛋糕做大效应

再有一个，大家看到，有人算出来 0.61 的基尼系数，比如西南财经大学的甘黎。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事实上，任何国家的统计局，进行住户调查的时候都有一个难点，就是找不到两端的人口，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会遗漏。各国统计局的官员和技术人员经常会坐在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也许我们的问题更严重一些，但这是共同都有问题。甘黎这样一些学者的目的，就是努力把上端最富

的人挑出来，也努力把最穷的人挑出来。因此这种研究是有意义的，会告诉你差距出在哪里。但这样得出来的结论，不能拿到国际上去比较。不能说和美国的相比，高了多少。这个研究可以接受，但是不能进行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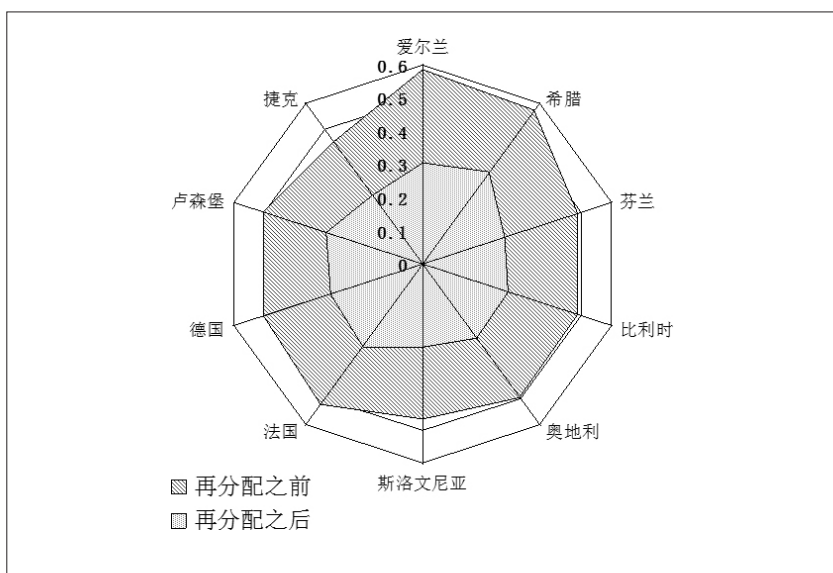


图 7：再分配政策是关键

我们分几个组来看他们的收入增长，总体上来说，他们的增长速度是差不多的，没有明显的说，富裕群体增长更快，低收入群体增长很慢，迄今为止大体上还是平衡的。我们得益于做大蛋糕效应，相对变化也还比较好。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不要减速，不要使蛋糕没有变化了。同时，我们还要积极改善收入差距。现在还没有充分利用的一个工具呢，我觉得就是再分配政策。因为我们知道，决定收入分

配问题的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的幅度非常微妙，你不好好调节它，可能会造成过大的收入差距，但是你干预过多，就会伤害市场，伤害激励。因此那个文章应该适可而止，但再分配的文章可以做得大一些。

我看了 OECD，挑了 10 个国家，看他们的基尼系数怎么缩小的。他们告诉你的基尼系数都比较低，都在 0.3 左右。但是你还可以得到一个数据，是进行再分配之前的基尼系数，外面这个圈。爱尔兰比较绝对，快到 0.6 了，比我们还高出很多。也就是说，最终的收入差距，一次分配是不能完全解决的，甚至可能主要靠再分配解决。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做了很多再分配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有一些领导，现在已经出来说，中国再分配做得太过分了，我们已经出现了民粹主义的倾向。我倒觉得，民粹主义是我们要防止的倾向，但是至少中国的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远远达不到民粹主义的级别。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体制这个东西呢，既得利益形成了，能够在那里取得大份额的人，恰恰是能够影响政策的人。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美国政治学家做的一个计量研究。他选了 1 千多种美国可能影响收入的政策。他看这些政策是用什么机制，由谁来决定的，怎么影响政策形成的。最后他发现，这些政策不是靠普通投票人推动的，也不是靠那些大众利益集团推动的，而是由精英利益集团以及大资本群体决定的。恰恰因为这一点，导致了美国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成了发达国家中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因此说，体制是由谁来决定，由哪一个群体来影响政策，对收入差距有很大的影响，也影响改革是不是能够推进。当然了，我们还谈不到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体制已经僵化。但是我们的改革也的

确遇到了既得利益的阻挠。所以这个时候，我想改革必须直面既得利益集团。你想回避它，只要有你在，我就躲着，我先改别的。现在呢，没有别的可改了。我们过去叫帕累托改进，这个改进会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而不伤害其他人，这种改进都改完了。现在只要改革，一定有既得利益在其中，因此你不能回避它。你就要突破它，或者至少要收买它。你想不伤害既得利益集团，不跟它发生冲突，改革就不可能推进。

Why
Nations Fail: Origins of Power,
Poverty and Prosperity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美】德隆·阿西莫格鲁 【美】詹姆斯·A. 罗宾逊 著
李增刚 译 徐 彬 校

	榨取性政治制度	分享性政治制度
榨取性经济制度	稳定	不稳定
分享性经济制度	不稳定	稳定

图 8：四种情况

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两个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有两类经济体制，就是榨取性的和分享性的经济制度；有两类政治体制，就是榨取性的和分享性的政治

制度。如果你的政治制度是榨取性的，经济制度也是榨取性的，两个一致是稳定的。如果两个都是分享性的，对普通家庭有利，也比较稳定。但是，分享性政治制度和榨取性经济制度不相容，最后一定要改变。拉美到了第四步的时候，就逐渐走向都是榨取性的，走向稳定了。这四种分法可能性太绝对了。我们不敢说我们在哪里，但至少我们目前也处在一个往哪边走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虽然经济增长还没有停滞，收入差距呈现了向好的趋势，但是面对改革，如果不突破既得利益群体，体制不会停留在原处，因为它是不稳定的，或者往这里走，或者往那里走。这是我们从四步曲中得到的启示。

那么推进改革呢，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叫做卡尔多改进，就是说对既得利益群体，我要收买它，要给它补偿。为什么要给它补偿呢？我们终究是为了一个新的体制。怎么补偿呢？改革是可以带来红利的，这一点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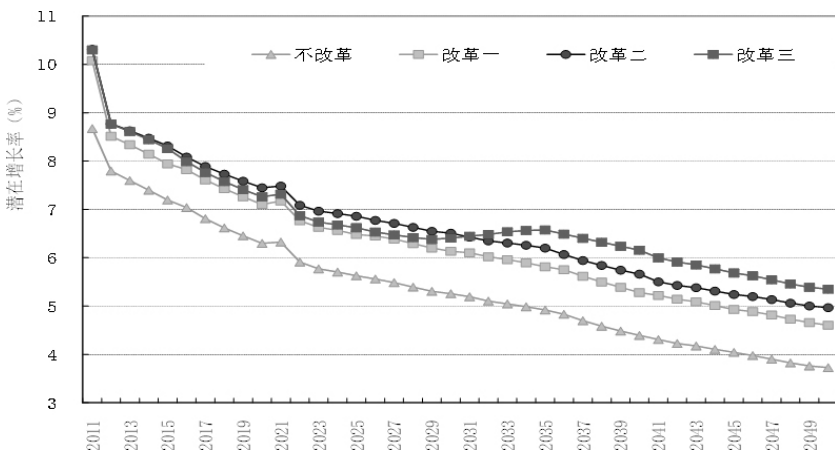


图 9：清除体制障碍可获改革红利

我们做了一个模拟，设想一种改革，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这是可以有的。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就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比如教育制度改革，就可以改善我们的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是可能的，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更好地配置资源，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生育率，我们放开二胎，就可以提高未来的生育率。这些呢，我们做一个合理的幅度。最后测算的结果是说（图9），如果我们没有这么改革，我们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就像最下面这条绿线一路走下去。虽然可能没那么悲观，但是长期趋势是向下的。但是和这些改革结合起来，不同的组合会达到上边这几条线的潜在增长率，这之间的距离就是我们可能获得的改革红利。好的情况下，未来可以有1到1.5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那也很不错啊。如果我们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是6.2%的话，比如十三五，加上一个百分点就变成7.2%，加上1.5个百分点就是7.7%了。这不是靠刺激需求得到的，而是通过改革得到的红利。否则的话，我们就有可能陷入日本那样的路径，但得到的结果是中等收入陷阱。

我就说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讨论。

提问与讨论

乔依德：非常感谢蔡昉院长给我们了一个很精彩的演讲。两周以前我们也举办了一个沙龙，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作的演讲。马骏讲的是比较短期的，蔡昉讲的是中长期，特别是中期的，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在座可能也会同意我的判断，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条理非常清楚，我们听了以后有很多收益。下面我们就到了提问或评论

阶段，在座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或者有什么评论也可以。王行长，你先开始。

王世豪：非常感谢蔡院长的精采演讲。你的演讲学术性非常强，有定性的，有定量的，同时有国内国际的广阔视野，现实和历史的深度，我非常有收获，尤其是从人口的角度。你最后说到，如果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有两件事，第一个是做大蛋糕，第二是合理分配蛋糕。关于做大蛋糕呢，你刚才提的比较少一点。最后你确实提到了做大蛋糕，是从人口角度去谈的。如果再广阔一下，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来做大蛋糕？关于分配蛋糕，这个月就有两件事。一个是对民营资本进入了一种思潮“不能让李嘉诚跑了”，一部分人有这样的思想，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分配的一种。另一个，这个月国务院出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就是你刚才说的，打破垄断的事情。最近还有两件事，一个是对基层普通大众的，全员持股这样一种股权制度，国务院指导意见里面也有。另外，对精英集团，采取限薪政策，这个月基本上全部实行了。减掉的量全部超过 50% 以上，力度比较大。对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我觉得反腐到现在，八项规定也是蛮严的。你对这些，有什么评论？谢谢。

蔡昉：其实我一直关心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也注意到了，我们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讲了很长时间，大家最后找不到改革改在哪里了。最直接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央企老总的减薪。与其说这是改善收入分配，还不如说是规范公务员和央企负责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对这批人来说，他昨天还是公务员，今天变成这个企业领导了，一下子拿这么多钱，可能造成很多不协调的地方。而且我认为，你一定要减，就减他们的，不要减下面员工的，那没有用，和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无关。我最后发现，真正收入分配改善呢，市场是可以做的。我为什么要预想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会出现一个库兹涅茨转折点，就是因为市场资本和劳动的相对稀缺度变了，那么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回报，因此就会有一定的变化。与此同时，它也不是纯粹的市场变化，因为当劳动力稀缺程度变了的时候，任何国家在这个阶段，他们会用两种方式表达不满。第一，退出。过去我不敢退，为什么不敢退？因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我哪敢走啊？现在呢，工作到处都有，我对你不满，我就退出。再一种表达方式呢，当我敢退出的时候，我就敢说话了，敢反抗了，我可以罢工，可以谈判，可以表达不满，写意见书。这两种方式都会出现，是在特定发展阶段才会出现。出现的结果就是形成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设。这时候工会的作用，最低工资制度的建设，还有各种谈判，包括集体谈判产生新的变化，这些都在一次分配中表现出来。这个我们要推动它。但是更重要的一条，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做到的，比如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并不是累进制的。我们大部分的税都来自中等收入，富人还没有充分纳税，或者你没有设计好让他们充分纳税。因此，这部分的潜力非常大。为什么我要看 OECD 国家的基尼系数是怎么降下来的？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政府让它降下来的，这部分应该做更多的事情。

国有企业的改革呢，其实我们这些年，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总觉得不太理想，是吧？这次也有人认为不解渴。我倒觉得，国有企业的核心其实是垄断问题。而国有企业的垄断问题，并不应该在国有企业改革本身解决。因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是讲它的治理机制，讲它的资产管理问题。垄断的问题应该是竞争政策要解决的。如果这么看，我们对国有企业

改革的方案就会更满意一些。否则的话，我们会觉得没有解决竞争的问题。我觉得，垄断应该是竞争政策的问题，不是国有企业改革本身。

肖明智：蔡院长，你好！我来自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我当时的博士论文正好写中国人口老龄化，用了不少你的观点。但是最近两年，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储蓄也会下降，带来资本供给的下降，这样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但是我们中国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这两年其实并不是供给不足，好像是供给过剩。因为人口老龄化以后，劳动力供给减少了，消费率上升了，应该会缓解现在供给过剩的情况。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个情况？

蔡昉：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的很好。现在大家知道，对于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形成了至少两拨人的争论。一拨人强调需求侧的问题，说中国的减速是需求侧的问题。还有一拨人呢，主张是供给侧的问题，有人由此形成了一个新供给学派，还成立一个研究院。但是我看他们文章，看得莫名其妙，他们讲的全是需求的因素，全是刺激因素。也就是说，供给不足，那不就应该刺激它吗，应该给它贷款，应该给它投入。其实不是这个含义。当我们讲它是供给侧问题的时候，是说你不在能够用原有的成本、原有的增长方式，保持那样的增长速度。从你的竞争力上看，你生产原来同样的东西，不再有市场了，不是你的需求因素，是你的比较优势变了，你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竞争力下降了。所以，当我们讲供给方因素的时候，是指你的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导致价格提高，同时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能支持你保持原来的竞争力。我觉得新供给学派就犯了这个错误，所以他们

说自己是新供给学派，但得出的政策结论全部是刺激需求。我觉得这个是混淆了。

张明海：蔡院长，紧紧围绕你的题目中等收入陷阱，我问一个问题。你说，中等收入陷阱有可能通过很多政策回避掉，通过收入分配政策或者供给政策。但是我想，在历史上，可能有很多国家，有意无意都采取过这种政策，但是最终没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尤其像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国家，从中等收入陷阱里走出来的，有没有案例？我们现在讲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一些小国家，韩国或者新加坡。好比说美国，美国如果没有南美战争，没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两次大战，它是不是也会进入某种程度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我们可以采取很多分配政策、需求政策，可能最终不起效果。那么我们是不是也保持中等收入陷阱，等 30 年，寻找一次意外横财的机会？是不是可以这样？

蔡昉：如果直接回答，我觉得没有飞来横财，美国也会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它是不是世界上第一号，决定世界经济秩序的国家呢？那当然不一定，但它肯定是发达国家。因为我们看到，英国工业革命以后，或迟或晚，在原来那个俱乐部中，大家都跟着它进入到了发达经济体。在老牌西方国家之后，新生的这些赶超国家，确实还没有看到一个大经济体能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假设说，中国在 2020 年代的某一天达到了人均 GDP12000 美元（按照 2010 年价），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这就跨越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即使到那个水平上，按照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内部差距这么大，相当多的部分距离发达国其实还差的很远。12000 美元本身也是最低标准的高收入国家。所以我倒是不那么乐观。我认为中国发展

的道路还是非常非常的长。我们也知道，阿根廷在历史上，曾经超过人均 GDP1 万美元，说不定都是 2 万美元，但后来它的人均水平是负增长，现在还没有回到当年的水平上去。这说明跨入了那个门槛，也不是保险箱。日本是跨过去了，是两三万美元跨进去的，所以它只要不是负增长，长期停滞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你是一个最低门槛跨进去的，长期停滞也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我个人并不是很乐观，就是说还有很多事要做。

乔依德：后起的大经济体进入发达国家，日本就是一个例子。

刘海影：我提的问题跟你的演讲是密切相关的，就是中国潜在的增长速度到底是多少。林毅夫的说法不是特别严谨，就是说，中国有潜力达到 8% 的增长和中国潜在 GDP 增速是 8%，不是一个概念。但是要回答中国潜在增长速度是多少，实际上我们碰到的困难是在学术层面。比如说，我们所依据的增长理论是一个逻辑循环。我相信，对于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判断，对中国人来说具有一个生死攸关的含义。因为你判断在一个位置，实际上在另一个位置，对经济政策而言，采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另外我觉得，不管我们学术界也好，舆论的讨论也好，这种讨论还是不够充分的。我在设想，我们作为一个研究共同体，有没有机会邀请更多的学者或者政府官员，对这个问题真正展开研讨。林毅夫作为乐观态度出来的结论，如果从学术层面去批评的话，很多是类比含义下的结论，其实是不够严格的。我们现有讨论的质量和数据还是有所欠缺的。我的问题是，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方面，是否必要或是否有可能，展开更多的学术界的共同探讨？

蔡昉：当然也必要，当然也有可能，老乔就可以组织。我个人觉得，潜在增长率，你要真研究，估算的时候确实可能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看法、不同结果。我觉得至少有几条是应该澄清的。我们看到国内有人在做，说测算出潜在增长率是多少，需求方因素影响多少，供给方因素影响了多少，这显然不对，潜在增长不能有任何需求方的因素。我们做的也很糟糕，因为我们的潜在增长是波动的，为什么呢？就是你说的什么自我循环。因为我测算，总要用数据，而数据都是结果。未来的数据不是结果，我可以虚拟。过去的都是结果，结果都是供给和需求共同影响的，所以你得出的结果只能是波动的。过去我在国外讲的时候，人家也笑，说蔡教授的潜在增长率是波动的。我说，你给我来一个不波动的看看。当然，如果把2010年之前的35年，都算作10%也可以。所以我觉得，可以澄清概念，可以大家研究一些方法。其实国外也没有很多好东西可以借鉴，因为对于一个稳态经济来说，均值就是它的潜在增长，它不用算。

费方域：你刚才说到可能采取错误政策。我的问题是，如果它没有抓住这个时期，没有采取你刚才说的正确政策，后面还可不可以补救？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不可以补救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想尽办法，大家要采取这个政策。关于日本有两篇文章，一篇是说失去的十年，后来又出了一篇说失去的20年。后面一篇我不太清楚，我记得第一篇文章里，已经讲到它的第一个十年，主要是劳动力，一个是人口问题，一个是劳动时间问题。如果它当时已经认识到原因，为什么后面的十年，它没有在这方面采取措施？安倍好像也是在需求上面做文章，这怎么解释？

蔡昉：你说窗口期这个事，我觉得任何时候都有窗口

期，哪怕我已经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你看拉美，也不是那么糟，巴西至少靠中国还增长了十年。如果他们政策对了，也许最终也可以走出这个困境。但是，我们最后有多少窗口，其实取决于犯的错误有多大。我说的那个错误，是指解决供给方因素的政策都不用，去需求工具箱里找办法，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不断放钱，这个钱放出去很大。现在我们也放出来了很多，结果不去实体经济，不去基础设施，都去了容易产生泡沫的地方。这时候，主流媒体还要号召发展股票市场，出了事你还要救它，就有可能在未来推出更大的问题，那时候你也救不起了，最后可能一失蹄，像日本一样，你可能耽误掉至少十年。

关于日本呢，其实它的问题出在劳动力不足上。日本人都讲老龄化，现在都知道是老龄化造成的。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不够，仅仅说是老龄化、人口问题还不够。第一个十年，那时候日本没有一个企业缺资金，小企业也不缺，但问题都出在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改善。就是说，你劳动力成本提高是必然的，资本回报率下降也是必然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转向，用新的增长源泉替代旧的增长源泉。我看过他们做的分解，最后发现，后来日本的劳动生产率还在提高，什么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呢？就是花钱，用机器替代劳动力，这个给堆起来了。人力资本有一点点贡献。资本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高达 94%，人力资本还有一点。最后的结果，是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是负的，这就是它的问题。所以第一个十年，他也许没有懂。第二个十年，他也许看了这个文章，看了也没有当回事。

从安倍经济学的角度说呢，主要仍然放在需求方因素，三个箭头的前两个都是这个，所以也没有奏效。他们说，我

们认识到后一个是最重要的。但是，大多数政府是不知道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怎么提高的。我们讲创新驱动，但是如果我们越想找到一个抓手去推动创新驱动，我们越不能做到创新驱动。因为创新驱动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手段，这个结果靠什么推动呢？创造性破坏。只有政府不管经济了，少管经济了，才可能发生创造性破坏。只要有政府在中间，政府永远不愿意承认失败，破坏也不能破坏到我身上。我们必须要有创造性破坏。经济增长速度现在降下来，至少是必要的，甚至低一点都不见得是坏事，越高越是坏事，该破坏的不破坏就不可能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我看文献，他们说在美国那样的经济体，通过创造性破坏，企业之间重新配置资源，咱们两个是同一个领域的，你的生产率比我低，对不起，你的生产要素应该给我用，所以你就滚蛋。这样的方式获得的效率，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占了 50%。我们还没有这个。中国的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是美国的不知道多少倍。如果这个能够降到美国那个水平，他们估算过，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提高一倍。

乔依德：最后我利用主持人的特权提一个问题。刚才王行长说到现在国企老总减薪，你刚才也解释了，不应该从国企改革的角度，应该从平衡公务员和国企老总的关系来看，这当然可以。但是问题来了，国有企业依然是党管干部，是组织部派的，减薪减的很厉害。我们前两天开了个会，有人说，本来年薪 400 万，现在一下子降到 70 万，反过来中层管理人员是市场化的，不是党管的，可能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要高于第一、第二把手，企业这样的激励机制好像是很难持久的。你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同意，一个人不能又想要公务员的好处，又拿高工资，这个不对。但是这可以切

断，你到企业就按市场决定工资，不是很好吗？现在的倒挂，我觉得很难持久。

蔡昉：如果你问我的观点，我会说，国有企业的问题不在于它挣的多，而在于它不是靠竞争挣来的，它可能是利用政策给它的垄断权力挣来的，所以它形成一个天价工资并不合理。尽管你比民营的低，但仍然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解决了公平竞争的问题，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决定这种半官员半企业家的工资，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限薪，我觉得也不见得错。但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限他们薪的时候，他们心里不服，就用各种方式把下面的薪也给限了。我听到很多，他们借机把一线的工资也调整了，这就导致企业激励的问题。如果仅仅限在中管干部或国资委管的干部身上，我觉得还可以，到此为止不能往下限。

乔依德：这个倒挂，我想很难持久。国有企业到最后，就算一二把手不减下面的中管干部，这个倒挂恐怕也不行。好，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蔡昉先生的演讲表示感谢，也感谢大家参加我们的活动。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